

# 红旗



---

一九七三年 11



#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 目 录

## 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 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学习十大文件的体会……………洪 原（3）

分析好，大有益……………江 汉（8）

### 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农民

——山西昔阳县的调查报告……………（13）

### 依靠工人阶级 加速煤炭生产

……………中国共产党开滦煤矿委员会（20）

### 正确对待群众才能执行正确路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 肉孜·吐尔迪（25）



## 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 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罗思鼎（30）

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劲云戈（41）

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孙文光（47）

## 思想评论

人类在战胜异常气候中前进.....上海市气象局写作组（55）

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促进派.....严志（60）

谈反潮流.....李庆霖（65）

##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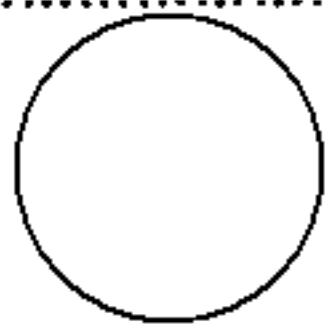
### 科学普及读物要生动地宣传唯物辩证法

——评新版《十万个为什么》.....翟青（68）

### 这样的评价符合历史实际吗？

——评《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对孔子的介绍.....钟泽宋新（73）

☆十一月一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



#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 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 共产党员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学习十大文件的体会

洪 原

党的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再次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做到“为  
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按照党章规定的这个  
要求，努力改造世界观，坚持立党为公的宗旨，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坚  
强战士，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服务，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在我们党的建设过程中，毛主席一贯地用立党为公、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  
谋利益的思想教育全党。毛主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  
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  
是为地、富、反、坏、右。”毛主席的指示，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历史任务出  
发，深刻地阐明了我们党的建党宗旨。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彻底性的一个阶级。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  
益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  
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当作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以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自己奋斗的最高  
纲领。我们党以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以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以密切联  
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以无数优秀党员的英勇牺牲和广大党员的实际行动，忠诚地



实践了立党为公的宗旨。五十多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一个贫困落后、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建设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一切，都是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就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历史。我国各族人民从切身的经验中看到，在中国，只有共产党真心实意地为人民做好事，领导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把中国的事情搞好。我们党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热爱我们党，拥护我们党，把我们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为大救星、红太阳。

从陈独秀以来的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反对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他们拉山头，搞宗派，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妄图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使党变成少数剥削阶级攫取私利的工具。列宁指出：“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第二国际的破产》）资产阶级是一个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剥削阶级，它剥削、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损人利己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坚持立党为私，正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本性决定的。他们企图通过推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引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适合资产阶级一党一派的私利。林彪抱着立党为私的个人野心，在我们党内，经营了几十年。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利益和愿望。这个无耻叛徒，也侈谈什么“公”，他抽去“公”和“私”的具体的阶级内容，是为了掩盖自己反人民的面目，他所说的“公”，就是他所代表的那个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只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者的私利。

既然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是为少数剥削者谋利益的，他们就必然把自己放在同党和人民相对立的地位，人心所背，不可避免地要垮台；即使象林彪这样一个惯于搞阴谋诡计的反革命两面派，也只能骗人一时，不能骗人长久，到头来终究彻底



暴露出他假共产党员、真叛徒卖国贼的面目。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一定要大资本家，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刘少奇、林彪这些家伙，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资产阶级化了的修正主义分子。地主、资本家假手这些派进来和拉出去的披着“共产党”外衣的代理人来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比他们亲自出马还好，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们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这个特点和规律，提高警惕，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及其代理人的一切危害党、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一个共产党员，要坚持立党为公，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就要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特别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归根到底，就是坚持还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做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有的同志也讲路线，但就是忘掉了党的基本路线，这是很危险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就曾经指出：“**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也就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背离了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就谈不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实践反复证明，凡是认真地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时候和地方，革命和建设事业就有正确的方向，工作就有成绩，人民群众就受益；如果忘记党的基本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要迷失方向，工作就要受挫折，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我们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各项工作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掌握党的基本路线。

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尖锐斗争的过程，必然要遇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抗，遇到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的干扰和破坏。我们共产党员，要坚





持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对于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问题,就要出以公心,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正确的,反对和抵制错误的东西。任何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都是有利于少数剥削阶级,不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同它们作斗争,便是以实际行动捍卫党的基本路线,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要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积极地正确地开展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有的同志对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并不是完全没有识别出来,但是由于私心,不敢反,不敢斗,遇到问题绕道走,事关大局少开口,这不是共产党员应持的态度。毛主席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我们要永远记住并认真实践毛主席这番语重心长的教导。

坚持立党为公,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就要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人,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奋斗。毛主席教导说:“**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靠少数人不行,必须团结大多数人,“**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在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要团结大多数;在国际,反对帝、修、反,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也要团结大多数。因此,不论是新干部还是老干部,这一部分干部或那一部分干部,不论那个地区、那个民族的同志,都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齐心协力,做好工作。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牺牲党和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共产党员所不取的。一个人如果坚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就会被少数人的狭隘私利蒙住眼睛,看不到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发展下去,宗派观念就要超过党的观念,甚至走上反党勾结的道路。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我们应当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对待各种意见。毛主席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坚持这样的立场,我们就可以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发



扬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取得正确的认识，达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坚强团结。那种不首先分清是否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合乎无产阶级党性和党的政策，与自己观点相同的就亲，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就疏，甚至纠缠历史旧账，争个人高低的作法，是不顾大局的表现，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应当坚决克服。

为什么人谋利益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才能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终身。我们许多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够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艰苦环境中百折不挠，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为人民作出不平凡的业绩，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导。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极其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于坚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是何等重要。

不破不立。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必须深入开展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革命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它是立党为私的思想根源。党内斗争的实践证明，一个头脑里装着资产阶级脏东西的人，是不可能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当前，批林整风运动正在继续开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正在不断深入。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复杂的。资产阶级总是想通过各种渠道，用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来毒害人们的思想，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阻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此，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既是每个共产党员思想改造的需要，又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武装自己，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作用，在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伟大斗争中，作出新的贡献。



# 分析好，大有益

江 汉

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了解实际情况，认真分析问题，作出正确结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必须具有的态度，也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在工作中时刻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

在我们党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毛主席一贯教导全党同志，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全党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同时它又为政治路线服务。没有正确的认识路线，就不可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的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取得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阻挠和破坏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现，



往往采取形而上学的诡辩来冒充唯物辩证法，反对、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刘少奇就叫嚣过调查研究的方法“过时”了，并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和群众路线。林彪也胡说过什么“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来，是从主观到客观”。这种割裂认识和实践辩证统一的关系，制造所谓“倒过来”之类的谬论，实际上是要以他头脑里想出来的一套东西，强加于客观实际。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认识路线。林彪宣扬这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强调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了解实际情况，认真分析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就要和刘少奇、林彪的唯心论的认识路线划清界限，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况出发，根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

**“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改造我们的学习》）充分地占有材料，明了各方面情况，是我们观察国内外政治形势，分析研究问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落实政策，做好工作的客观基础。认真分析研究的过程，就是通过我们的头脑对调查得来的材料进行加工制作的过程。没有数量上充分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材料，头脑这个加工厂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不作调查，不了解实情，所谓分析研究必然是空幻的议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凭着少量的、片面的材料，也不会有中肯的分析。这是由于少量的、片面的材料，没有反映事物矛盾的总体，也没有反映矛盾各方的特点，如果贸然地依靠它们去动手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就不能不出乱子。当然，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把客观过程的一切细节都了解到，但是，了解当前事物发展的基本状况、基本特点、基本趋势，则是可以做到也必须努力做到的。为了获得全面而真实的材料，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认真的周密细致的调查。既要调查全面的情况，又要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作深入的典型调查。这样，我们的判断和推理才具有可靠的依据，才能把对问题的结论真正建立在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基础上。

有了大量可靠的材料，并不等于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十分重要的是，必



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里，一切社会现象都同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着。由于人们的阶级立场不同，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不一样，即使对相同的问题和材料，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我们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去观察问题，看待形势，就失去了入门的钥匙，失去了衡量是非的标准，所谓客观地调查情况，正确地分析研究问题，便无从谈起。我们革命党人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各级领导部门要在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经常了解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动态，及时研究各个阶级的发展和变化，善于作基本阶级关系的分析，正确地估量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政治形势。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直接的同盟者，谁是间接的同盟者；分清什么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事物，什么是露骨地宣扬或伪装起来贩卖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一切矛盾和斗争，孤立和打击我们最主要的敌人。

毛主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实践论》）分析问题时善于抓住事物的实质，不为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这很要紧。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联系，但决不是彼此等同。有些现象比较明显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的某些方面；另外一些现象曲折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还有些则是假象，歪曲地甚至颠倒地反映本质。特别在社会生活中，那些腐朽没落的行将灭亡的反动势力，为了他们现在的生存，有时公开地、凶相毕露地显现出反动的本性，有时则用各种假象掩盖其实质。例如，苏修叛徒集团明明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却常常竭力装出一副伪善的“关心”人民的“生活”“福利”的面孔；两个超级大国明明彼此之间出于利己主义的目的，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竭力划分势力范围，却偏要高喊什么



“合作”“和平”，装出握手言欢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决不可被歪曲地反映本质的假象或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能把现象和本质等同起来，而是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把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深入事物的内部，考察矛盾的各个方面，全力抓住和揭露事物的实质。任何事物内部都有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所谓对问题要看本质、看主流，就是指要从事物的主要矛盾方面去看。对待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分清究竟好的、正确的、成绩的方面是主要的，还是坏的、错误的、缺点的方面是主要的。这个界限必须划清楚，否则就会颠倒主次，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分析国际形势，也要弄清人民革命的潮流是当前的主要倾向，还是反革命的逆流占支配地位。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基本的估计，就会方向不明，左右摇摆，得出错误的结论，产生唯心的工作指导。

分析任何事物，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我们在分析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党内的路线斗争就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必然会用种种方法进行破坏活动，并同国内的阶级敌人相勾结。因此，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注意分析各个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特点，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注意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这都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经常要加以具体分析的问题。

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分析研究问题，也就是认识客观世界，同样需要有一个过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特别是对那些重大问题，包含着多方面的矛盾，错综复杂。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或者是我们掌握的材料尚不充分，或者是事物本身的某些方面暴露还不明显，一时不容易全面认识它。对于这一类矛盾，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认真地进行多次分析研究。要过细，要反对粗枝大叶的态度。如果情况不明了，只凭着片鳞半爪





的材料，轻率地做出结论，就会在工作中犯错误。如果因为情况尚未完全清楚就不去注意已经暴露的苗头和倾向，也会在工作中犯错误。正确的态度是，既及时抓住倾向性的问题，就已有的材料进行初步的恰当的分析，又使我们的认识随着实践过程发展而发展，使认识逐步深化，逐步接近事物的本质。越是复杂的矛盾，越是要用气力，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复的分析。这样，才能识别那些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而坚决反对之，才能看清那些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而坚决支持之。列宁说：“**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几个争论问题》）如果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我们有的同志虽然有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做好工作的愿望，但是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根本的原因，是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毛主席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必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为此，我们应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使之适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只有在斗争实践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从思想上彻底洗刷那些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东西，提高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办事的自觉性。

分析好，大有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越是在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理解就越深刻，行动起来也越有保证。通过批林整风运动，广大领导干部更加自觉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握各方面情况，认真分析研究，抓住主要矛盾，推动全盘工作，促进了大好形势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认真学习党的十大文件，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正确地分析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 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农民

## ——山西昔阳县的调查报告

凡是到山西省昔阳县农村参观过的，都明显地感觉到近几年来这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昔阳县深入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六年时间里，昔阳人民通过自己的**艰苦劳动**，把四十万亩耕地中的三十二万亩建设成了高标准的大寨田。六年里搞了五千五百多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这些工程的建成，使水浇地增加，水土流失大大减轻，全县五条乱石滚滚的干河川和三千多条荒沟的面貌改观，造田五万二千多亩。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粮食连年增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社员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一九七一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六年增加了一点八倍；全县集体经济总收入相当于一九六六年的二点五倍，每个农村人口从集体经济分配到的收入相当于一九六六年的二点一倍。去年虽然是百年不遇的大旱，但仍然获得丰收。

这个变化确实很大。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同昔阳的同志们议论，为什么近几年来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们共同认为，主要是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使得党的基本路线得到更好的执行。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大大提高，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使昔阳农村到处呈现了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许多同志深有体会地说：“不然的话，山变好了，可以再变坏；产量变高了，可以再变低；只有人觉悟了，社会主义阵地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几年来，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关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教导，昔阳县坚持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取得显著成效。山川易貌，产量剧增，正是下功夫搞好人的思想建设的结果。





## 根本的问题在于路线

昔阳县各级党组织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抓紧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经过一段不断认识和实践的过程。

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光辉旗帜，为我国农村在所有制变革以后如何继续革命，发展农业生产，指出了方向，指引着全国亿万农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但是，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大寨精神在昔阳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大寨经验没有得到深入推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揭发出来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给了各级干部很深的教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县委联系过去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经验教训，重新学习和研究了大寨的经验，重新认识大寨的历史。在总结中，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刘少奇刮起资本主义妖风的时候，大寨能辨清方向，能顶得住？为什么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大寨的群众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能够那样坚定地继续前进？为什么大寨的群众，干社会主义的事，能那样认真、负责，社会主义积极性那样高？大寨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丰富实践，启发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因为大寨党支部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坚持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原则，全力去提高社员群众的路线觉悟，从而能够排除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战胜阶级敌人的种种破坏，不断取得革命和生产的胜利。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可能有统一的革命意志，人们也就不会迸发出那么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单纯就生产领导生产，大寨的经验是不可能真正学到手的。

“有比较才能鉴别。”在总结中，大家普遍联系到两个后进变先进的大队的事例，进一步加深自己的认识。武家坪大队和大寨，村连村，地连地，大寨平时干什么事，武家坪都看得见。按理说，对大寨的经验，武家坪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这个地方过去硬是“近水楼台不得月”，一直在那里嚷嚷“村大人多心不齐，要学大寨不容易”。井沟大队和大寨，两家背靠背，共靠着一架虎头山。



井沟大队的干部站在虎头山上，看见大寨生产面貌变化快，不服气。他们认为大寨主要是粮食产量上去了，因此只要自己生产上抓紧，完全可以赶上大寨。他们在生产上提出：“大寨干啥咱干啥，咱就会和大寨不差啥。”但是，结果出力不小，效果却不好。生产上大寨能办到的，它不一定能办到。阶级斗争的风浪一来，它就更顶不住了。这就说明，搞农业生产，不是简单的人和物，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土地、肥料加技术。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人们头脑里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一些旧思想、旧习惯，上层建筑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还严重地影响着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发挥。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将长期存在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自觉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提高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使农民群众树立起为革命种田的思想，那就不可能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打胜仗；要象大寨那样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迅速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也是不可能的。学大寨，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他们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经验。只有这样，才是抓住了根本，抓住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最重要的基本建设。

## 在斗争实践中提高群众的路线觉悟

毛主席教导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讲路线，就要讲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对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当作农村工作中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任务。

在这方面，几年来，昔阳县各级党组织着重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坚持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持续不断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在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他们做到紧紧围绕路线问题，重视联系实际，讲究学了就要应用，用就用在阶级斗争上，用在路线斗争上，用在思想斗争上。白羊峪公社的白羊峪



大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一个先进单位，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一段时间工作停顿不前，过去搞不清原因在那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支部组织群众对照大寨的经验，联系实际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过去白羊峪工作停顿，是思想停顿的反映，而思想停顿主要是观察问题时违背了对立统一的规律，忘记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在胜利面前看不见阶级斗争，看不见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使自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失去了继续革命的动力。紧接着，党支部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发动群众揭本大队阶级斗争的现象，摆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把党支部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上的问题挖出来，狠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样，这个大队的干部、群众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路线观念增强，工作有了朝气。

昔阳县各级党组织在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革命大批判的过程中，注意结合群众自己的实践去教育群众自己。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农村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广大群众对农村存在着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有亲身的体会。昔阳县在基本路线教育中，就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发动各个社、队的群众对照大寨过去和阶级敌人斗，和资本主义歪风邪气斗，和修正主义路线斗的实践经验，把本大队在所有制变革以后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翻了个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总结经验教训，大家初步弄清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和危害性，以及“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和“生产第一”等观点的反动实质所在。这样，大家的路线斗争觉悟就提高了一步，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就加强了。皋落公社皋落大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有的社员因为看到自己那里集体经济发展不快，因此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产生了一些看法。经过这样一翻，揭开了大队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家才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得很，大寨就是样板。自己那里没有搞好，原来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和抵制修正主义路线。如果早些提高自己的路线觉悟，象大寨那样，和阶级敌人斗，和资本主义歪风邪气斗，和修正主义路线斗，面貌早就发生了变化。



昔阳县从县到社到队，近几年来工作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很注意分析和掌握阶级斗争的形势，用抓阶级斗争去推动生产的发展。阶级敌人一跳出来，资本主义歪风邪气一冒出来，就受到批判和抵制。一九六九年底，界都公社西固壁大队要劈开寨岭山，让界都河改道，空出一个大河滩来造地。这时阶级敌人就利用封建迷信思想进行破坏。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及时揭露和狠狠地批判敌人的破坏活动，并且利用这个反面教材加深对群众的教育，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这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许多队都是这么做的。事实证明，凡是这样做了的，面貌变化就快；不然，就停滞不前。他们在不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揭露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同时，还有意识地揭矛盾，找队与队、社与社之间工作上的差距。发现矛盾，提出问题，就提高到路线的高度，通过思想政治工作，通过革命大批判来解决。这样密切结合农民具体实践来进行路线教育，就使广大农民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具体化，使党的基本路线在人们的头脑里逐步扎了根。

毛主席曾经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过去昔阳有的地方工作中有这样一个毛病，就是光实践不总结，特别是不重视围绕路线问题总结工作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大寨**的干部、群众路线觉悟比较高，认识问题的能力比较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能够自觉地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武器，及时总结三大革命运动斗争的经验，把它提高到理论高度、路线高度，再用以指导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县委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研究了大寨的经验，开始注意总结经验。除了一个队、一个社地总结解放以来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以外，现在还注意从路线上总结每年的实践经验。今年又普遍地开展了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六年大变的总结活动，总结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上的经验和教训。通过总结，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了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性。此外，他们平时办成一件事，也要总结；办不成一件事，也要总结。每办一段事，都出两个成果：一个是物质上的收获，一个是路线觉悟的提高。这样，就使大家的路线观念不断得到增强。大寨公



社后龙凤塄大队原来生产上不去，后来他们从路线上总结经验教训，开展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抓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路线觉悟，并采取了相应的具体措施，生产就上去了。他们再回过头来总结，大家就进一步认清了只有解决方向道路问题，生产才能得到发展。

## 帮助基层干部树立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思想

昔阳县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农民的工作主要是靠农村基层党支部来做的。过去，这个县有的党支部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往往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就事论事，忘记了路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基层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普遍提高，县委也特别注意帮助基层干部树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提高工作。从一九六七年冬天开始，他们年年冬春坚持整党。此外，他们还连续三年在大寨办了三十三期有四千多名基层干部参加的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请大寨党支部讲大寨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经验。通过学习，帮助基层干部从思想上提高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效果很好。许多基层干部对现阶段的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李家庄公社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是个老干部，大家都说他有能力，自己也觉得满不错，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大队的工作却一直上不去。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逐年整党，他总结了教训，提高了路线觉悟，在工作中比较自觉地注意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自己，教育群众，从而领导这个大队很快跃了上去。通过这段实践，他体会到，作为一个党的干部，最重要的就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离开了这一点，就谈不上什么工作能力，甚至可能走到邪路上去。有的干部，过去认为自己只要出身好，不贪污，不脱离劳动，就是好干部，现在经过逐年的整党，也认识到如果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忘记一个党员的本分，就谈不上是党的好干部。要做一个党的好干部，就必须象大寨干部那样，带头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在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带



领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成为领导群众向阶级敌人斗争的好带头人。

懂得了工作中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用党的路线武装群众，是不是就一定会做好这项工作？昔阳的实践证明，不是这样的。形势在发展，斗争在变化，人们的思想如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不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就会停滞或出现反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昔阳县学大寨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粮食产量成倍地增长。这时，有的地方就觉得该批的批了，该斗的斗了，成绩不小了，出现了松懈情绪。这件事对县委的同志是个很大的教育。他们感到，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不能放松的；必须不断抓好基层干部世界观的改造，牢固地树立继续革命的观点，才能使他们更好地带领群众前进。因此，从一九七〇年起，他们就反复地组织广大干部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教导，积极开展反骄破满的活动，引导干部进一步认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松懈麻痹。为了使广大干部树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他们还用总结典型经验，解剖麻雀的办法，教育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大寨专门召开了一次有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学大寨会。这一次学大寨会，不学别的，就学大寨是怎样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持续不断地抓好阶级斗争的。会议也不空泛地议论，而是由每个公社抓一个后进大队，搞集体解剖。杜庄公社就以杜庄大队为例，先由全公社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来揭这个大队阶级斗争的表现，摆阶级斗争的事实，摆不抓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危害，然后请这个大队党支部的干部摆他们当时在这些事实面前的看法和作法。通过反复比较和忆苦思甜，帮助这个大队党支部的干部从世界观上挖放松阶级斗争的原因，狠斗头脑中的“私”字。这一次会，每个公社抓了一个点，震动一大片，许多干部在会上流着眼泪回忆自己过去的苦，使大家进一步从世界观上解决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以后几年，各个公社又反复在整党中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巩固了斗争成果。

新华社记者 冯东书





# 依靠工人阶级 加速煤炭生产

中国共产党开滦煤矿委员会

我们矿是个有九十多年历史的老矿。矿井深、巷道远、设备旧，开采条件越来越困难。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老矿的面貌焕然一新，到处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随着批修整风运动的开展，又开创了一个新的跃进局面。一九七一年，创造了历史最高生产水平；一九七二年在遭受严重灾害的情况下，生产仍然持续上升，产量超过了设计能力的百分之四十三；今年头九个月，又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比去年同期的生产水平提高百分之十一以上。

为什么在开采条件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能够连续大幅度地增产呢？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了“鞍钢宪法”，认真学大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断挖掘生产潜力。

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是能不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广大工人群众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力军。依靠工人群众，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使社会主义企业沿着党的基本路线指引的航道向前发展，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工矿企业，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在批修整风中，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逐步加深认识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由于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煤炭生产逐年上升；一九六一年以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模糊了，群众运动不大搞了，挫伤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结果生产停滞不前；党的九大以后，特别是深入开展批修整风以来，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比



较好地依靠了工人阶级，不断地挖掘老矿潜力，生产持续大幅度增长，出现了一个新的跃进局面。事实充分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没有增加多少人，也没有增加多少设备，开采条件比过去不是好了，而是更困难了，为什么过去停滞不前，而现在能大幅度增产？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看执行什么路线。路线正确，依靠工人阶级，就能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生产条件差可以变好，困难可以变为顺利，低产可以变为高产，老矿可以作出新贡献。路线不对，不依靠工人阶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生产条件再好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生产一时上去了，也不会持久，还会降下来。

为了不断地提高工人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充分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几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把批修整风、批林整风放在首位，不断对广大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组织老工人忆苦思甜，进行新旧社会对比和两条路线对比。广大工人群众提高了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把生产每一吨煤，都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许多工人说：国家需要的煤越多，说明形势越好；任务越重，我们越光荣。我们多生产一吨煤，就是对国家多作一分贡献；少生产一吨煤，就是给国家计划留下一个缺口。有了这种革命责任感，就能出智慧，出风格，出干劲。我们有一个矿五号井的储煤仓需要更换固定溜煤嘴，领导上已经批准他们停产两天更换。但是，工人群众怀着“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生产一分一秒也不能停”的高度革命责任感，积极研究既不停产又能检修好的办法。他们主动组织起来，利用班前班后的时间，测量了每一个部件，掌握了五十多个数据，制订了四十八项检修措施。结果，在不停产的情况下，高质量地更换了溜煤嘴，为国家增产煤炭近两万吨。在开滦，象这样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国家增产煤炭的事例是很多的。

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工人群众，才能充分挖掘企业内部潜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煤炭生产。我们矿的煤炭产量在超过了设计能力之后，还能不能继续挖掘生产潜力，使产量继续增长？当时有的人认为，矿老，设备旧，提升运输能力有限，要增产就只有建新井。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教导，深入群众，围绕老矿还能不能增产这个问题，组织全矿群众开展大讨论。广大工人群众，回顾了历史，总结了经验，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地下有煤，这是挖掘潜力的物质基础，矿井可以延伸，设备可以改造，老矿大有可为。于是制订了通过挖掘潜力，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使产量大幅度增长的规划。

广大煤矿工人，常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熟知煤炭生产的规律，不仅了解而且有能力和解决生产上的各种矛盾。为了不断总结群众在生产斗争中的成功经验，寻找老矿挖掘潜力的办法，我们到基层和广大工人座谈。工人群众用生动的事实告诉我们：煤出在工作面上，要挖潜力，主要是从工作面上挖。这个道理，同农业上充分利用时间、空间和地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一样的。通过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对开滦煤矿历年生产情况的分析，我们明确地认识到，提高工作面的单位面积产量，是老矿挖潜的主攻方向。于是，我们集中力量注意加强正规循环作业，提高工程规格质量，搞好设备维修，使工作面产量逐年提高。一九七二年，平均工作面的月产量比一九六八年提高了一千三百多吨。等于一年从现有工作面中挖出一百五十三万吨的潜力。今年头九个月工作面的平均月产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又提高一千六百多吨。这说明，提高工作面产量，可以不增人，不增设备，是老矿挖掘潜力既经济又见效快的好方法。

潜力在基层，挖潜靠群众。老矿挖掘潜力，包括挖掘时间、空间、材料、设备、地质资源和人的潜力，而最主要的是挖掘人的潜力。因为，任何潜力的挖掘，都要靠人去实现。例如，在我们这样一个老矿要靠挖掘潜力实现大幅度增产，客观上存在许多困难。但是，广大工人群众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学习大庆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以“设备旧，思想要新；任务重，干劲要大；材料少，出煤要多”的决心和毅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的三结合小组，大搞技术革新，迅速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例如，按照常规，加大提升运输能力，需要增加新的设备，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需要停产，我们没有想到过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它，可是工人群众就提出来了。他们把一个按常规需要半年才能改造好的旧风井，仅用十九天就改好了。在改造另一个井时，又打破了几十年来矿井运行史上两种不同型号、容量、转数的电机，不能



搞合力牵引的老框框，用“大骡子驾辕，小驴拉帮套”的办法，在不停产的情况下，成功地搞出了一个电机和一个小电机并联的双机拖动，一年就可以多提升原煤五十多万吨。仅对老矿井进行技术改造这一项，就使现在全矿老矿井的提升运输能力，比一九六五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一·八，为大幅度增产煤炭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依靠工人阶级，不断认识老矿、改造老矿、发展老矿，使老矿作出了新贡献。一九六八年以来，开滦超过国家计划多增产煤炭四百三十多万吨，相当于新建四座大型矿井一年的产量；同时，材料消耗等节约了一亿三千二百多万元，用这些钱可以新建两座大型矿井。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在顺利的情况下要依靠群众，在遇到大的困难的时候更要依靠群众。一九七二年我们矿连续遭到两次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一个矿的一个巷道突然透水，严重地威胁着这个矿和临近两个矿的生产。接着，又有一个矿的重二百多吨的龙门吊被飓风刮倒了，也面临着停产的危险。当时，有的人认为，困难那么大，不好克服，产生了要求上级减任务的思想。我们认识到，减任务就是长了困难的威风，灭了工人阶级的志气。于是，就放手发动群众抢险救灾，在全矿迅速掀起了一个“上巷损失下巷补”、“一矿受灾各矿补”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结果，不但没有减产，还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这件事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困难交给群众，就会有办法，有力量，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如果遇到一点困难，受到一点挫折，出现一点自然灾害，就把群众甩在一边，少数人坐在屋子里发愁，在那里算死账，就会越看路越窄，越算越困难。所以，与困难作斗争，不仅是打生产仗，而且是打思想仗。只有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坚定不移，才能有战胜困难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领导有一个好的作风，对于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也十分重要。要依靠群众，就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知道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有什么要求、意见，创造了那些先进经验。这样，领导才能与群众想到一起，走到一条路上。领导成员深入基层，带头大干，不仅能鼓舞群众的斗志，振奋群众的革命精神，而且能使自己从群众中吸取“营养”，增长才干，把群众的经验、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形成领导的意见，实行正确而有力的领导。如果浮在上面，脱离群众，脱离



实际，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就会束手无策，落后于群众。为了更好地依靠群众，领导群众，我们党委的常委，除留少数人值班外，其余都分别到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各矿的主要领导干部经常在生产第一线，边劳动、边了解情况、边指挥生产。各采掘区的干部基本上都坚持跟班劳动。工人们说：我们流汗水，领导也流汗水；我们脸上有煤泥，领导的脸上也有煤泥，这样的领导我们信得过。这说明，群众的干劲，群众的情绪，同领导干部的作风有密切的关系。

依靠群众和加强领导是一致的。毛主席指出：“**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对领导工作的要求也更高了，思想政治工作、组织领导工作都要相应地跟上来。领导骨干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认真搞好调查研究，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善于组织和爱护群众的积极性。对于经过努力有可能办到的事情，不支持群众去办，就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对于在现有条件下经过努力仍然办不到的事情，搞瞎指挥，硬要群众去办，也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开滦煤炭产量能不能大幅度增长？开始争论是很大的，于是我们对全矿区先后进行了六次大的调查，从劳动组织状况、地质储量、设备状况等几个方面，一个一个矿，一个一个采区地进行了摸底。经过综合分析，摸清了老矿挖掘潜力的底数，我们认为实现大幅度增产是有基础的，是可能的。这说明，只要干部作风扎实，办事老实，群众的干劲才能持久，生产才能不断发展。

我们体会到，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就要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认真改造世界观，坚定地树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唯物史观，破除否认人民群众是世界历史创造者的唯心史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需要经过长期的磨练。我们决心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进一步改造世界观，更好地依靠工人阶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挖掘老矿潜力，加速发展煤炭生产，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 正确对待群众才能执行正确路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 肉孜·吐尔迪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能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一个胜利引向一个新的胜利。我们党五十多年的斗争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革命斗争的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要执行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解决好怎样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落实。

正确对待群众，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伟大领袖毛主席也谆谆教导我们：“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我们党还把“为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一条写进了自己的党章。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使各族劳动人民从地主（牧主）、资本家残酷压榨的牢笼里解放出来。我们这些在旧社会牛马不如的穷苦人，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在经济上摆脱了贫困。解放以后，毛主席率领我们搞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实现农业合作化，建立人民公社，使各族劳动人民走上越来越幸福的康庄大道。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广大劳动人民不象苏联人民那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使我国无产阶级江山不变颜色，又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的路线，就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的路线。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就能够团结起来，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奋斗，不断夺取新的



胜利。

路线不同，在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上，必然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立场和态度。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团结和引导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毛主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论联合政府》）共产党员要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奋斗。而刘少奇、林彪这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则把人民群众看作是“阿斗”、“群氓”，他们蔑视群众，压制群众，欺骗群众，散布“群众落后论”，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他们的路线和政策，归根结底，是要把已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扶植起来，剥削和奴役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把人民群众重新推进灾难深重的旧社会。这就是两条路线在对待人民群众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怎样对待群众，决不单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是坚持什么路线的重大原则问题。二十多年来，我在实际工作中，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概括起来说，正确对待了群众，工作就有成绩，路线就走得对；错误地对待了群众，就要迷失方向，就会走错路线。我比较长时期是在农村做基层工作。一九六三年，我们五星人民公社要兴修一条引天山雪水灌溉农田的大型渠道，渠长九十多里，要穿过一片戈壁滩，工程很大。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公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说，解放前曾经有好几个巴依（财主），雇了不少人去挖这条渠，都没有引下一滴水来，不用白费那力气啦。有人说，那是“圣水”，是“胡大”（上帝）管的，动不得，谁也别想把它引下来。也有人说，山洪水量太大，修什么渠也得被冲垮。广大贫下中农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去同一些老贫农商量，和广大贫下中农社员一起讨论，听到的就不是上面那一类论调。广大贫下中农说，多好啊！把那股山水引下来，我们吐鲁番盆地就可以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棉花、葡萄、哈密瓜，有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支援，有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拿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来，别说是修一条渠，就是把一座火焰山搬走也能成！贫下中农的话，教育和鼓舞了我们公社的领导成员，使我们更加确信，有党的领导，有广大贫下中农的丰富经验和坚强决心，哪怕困难再大，我们也有力量修成这条大渠。修渠工程开始了，全公社的贫下中农都要求上山筑渠。数以千计的社员，从山口一直到大戈壁滩，到处安营扎寨，摆开阵势，风餐露宿，艰苦奋斗。公社党



委的领导成员也和大家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干。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坚持干了两年多，一条全部用鹅卵石砌起来的、吐鲁番盆地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大渠到底修成功了。又坚固，又壮观，什么洪水也没有把它冲垮。当天山雪水第一次顺着渠道穿过戈壁流进地里的时候，不少老贫农兴奋得流下了眼泪，社员们都纵情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修成这条大渠的事实，有力地教育了那些反对派、保守派、怀疑派，也深深地教育了我自己：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各族劳动人民，真是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

领导生产要走群众路线，做好其他一切工作，也都离不了群众路线。前两年，我们县的火焰山公社，因为队与队争水，社员发生了纠纷，影响了团结和生产。县里责成我们几个同志去解决。开始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就分别召开了老贫农、党团员、基层干部等各种座谈会，到广大贫下中农中去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很快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原来，这场争水纠纷是由阶级敌人利用宗派情绪、利用宗教活动挑拨煽动起来的。搞清情况后，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揭发批判，社员群众说：“我们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擦亮眼睛，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有的社员说：“两只羊顶角，狼就有了食。我们要团结起来打豺狼，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广大社员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团结得更紧密了，革命生产都搞得很好。还有一次，我到葡萄公社光明大队去蹲点，这个队工作比较后进，但我不知道主要要抓什么，该从哪里下手使这个队工作赶上去。遵照毛主席关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的教导，我首先扛起坎土曼（和镢头相似的一种农具），到地里去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休息时和大家一起谈心，贫下中农管我叫“肉孜阿卡”（阿卡，即大哥），把心里话跟我讲。晚上，我又同队上的干部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谈工作。几天之后，我了解到这个队工作上不去的主要原因是领导班子不够团结，影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依靠了群众，就找到了落后的根源，就有了办法。通过办学习班，让干部们把话都摆到桌面上来讲，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干部的劲头起来了，带领群众干得很出色，这年，这个以生产葡萄为主的大队，粮食产量跨过了“黄河”，实现了历史上第一年粮食自给，变成了先进队。





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要很好地认识群众、对待群众和组织群众前进，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责任和义务。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我深深体会到，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首先决定于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得好不好。只有真正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才能做到正确地对待人民群众，才能有较高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一度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思想，感到自己从减租反霸、剿匪、土改开始，一直跟着党和毛主席走，搞互助组、搞合作社、搞人民公社，我都积极响应带头干；敌人要暗杀我，我不害怕；地富要搞垮社，我顶得住；建设吐鲁番绿洲，我出过力、立过功，……总之，看成绩多，看自己什么都好，简直是一块金子。正在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群众批评我的缺点错误，我就听不进，心里不服气。由于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结果，有一段时间，我脱离了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头脑里还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个教训很值得总结。一个人，有了骄傲情绪，就会忘记离开群众就一事无成这个真理，就不再把自己看作是群众中的普通一员，而把自己看得比群众高了。实际上，越觉得自己高，就越是离群众远，离群众越远，也就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远。高一点，远一点，高得多，就远得多，高到天上去，群众就会把你甩掉。有了骄傲情绪，就不能一分为二地正确看待自己，觉察不到自己脸上有灰，别人说你脸上有灰，就硬是不接受批评，反而埋怨群众不对。骄傲这东西，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不是唯物的，而是唯心的，它对我们联系群众，执行正确的路线，危害极大。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必然要从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脱离群众，一直到同群众对立。所以我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教育非常深刻，及时地给我敲了警钟，使我认识到和注意改正自己存在着的骄傲自大、脱离群众的毛病，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是在人的头脑里天生地、凭空地树立起来的，它必须在坚持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长期斗争中才能牢固树立。过去，我一直以为，我是长工出身，苦大仇深，一心跟着党和毛主席，就不会走错路，不会犯错误。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纠正了我这个错误认识。出身苦，对党和毛主席阶级感情



深，这是好的，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一个很好的条件。但是，朴素的阶级感情，并不能代替路线斗争觉悟。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在尖锐、复杂、长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刻苦地改造世界观，就免不了要犯错误，在革命大风浪里，就有可能栽跟头。我们党内出现过十次路线斗争，今后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也还会出象刘少奇、林彪这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果我们头脑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搞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那就还有可能要上当受骗，这是必须牢牢记取的深刻教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中，有许许多多丰富的事实告诉我们：干部犯错误，往往是从脱离群众开始的；而当一个干部执行了错误路线，他也就从根本上脱离了群众。对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来说，彻底改造世界观，防止产生错误和认真改正错误的根本途径，就是到群众里面去，向群众学习，和群众打成一片，让群众监督自己、管自己。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但必须这样做。我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感到，要当好干部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群众来管。群众最愿意管的干部，常常是很能联系群众、受群众拥护的干部。而群众最不愿意管的干部，至少说明这个干部本身就不愿意让群众来管，这个干部同群众的关系也就很糟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群众就喜欢接近你，跟你讲知心话。架子很大，盛气凌人，群众就会不买你的账，也不跟你讲心里话。一个干部如果坚决不要群众管，群众也就不来管你了，而真是到了群众不愿意管你的时候，你也就不能成为群众的干部了。试想，这样的干部，还能够执行好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吗？还能够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吗？当然不能。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取更大的胜利，我决心坚持认真看书学习，使自己更多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同时，一定要坚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任何时候都不特殊，任何时候都欢迎群众来管自己，一辈子当好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征途中，始终和群众一道前进，不断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 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 秦王朝建立过程中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罗 思 鼎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始皇所建立的封建统一事业，以及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都不能单纯归结于偶然的原因，而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必须注意“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秦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开始于秦孝公，完成于秦始皇，其间整整经历了七代国君。在这一百五十年中间，充满着激烈的变法与反变法、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秦始皇由于适应了封建制一定要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发展趋势，才能“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sup>①</sup>，统一了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汉承秦制”<sup>②</sup>，这说明秦所创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逆转不了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批判尊儒反法思潮，必须认清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而要正确认识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就必须弄清从秦孝公到秦始皇这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及其各个阶段的特点。



“秦行商君法而富强”<sup>③</sup>。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是秦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

商鞅变法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早在春秋时期，奴隶们反抗奴隶主奴役压迫的斗争连绵不断，推动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向私田征税，承认土地的私有，使奴隶制经济打破了一个大缺口。到了战国初期，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中原各诸侯国程度不等地发生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的反抗也十分激烈，著名的以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就发生在秦国<sup>④</sup>，据《庄子·盗跖》篇记载，跖率领“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沉重地打击了秦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同时，商鞅变法以前，秦国的大权落在庶长——宗族奴隶主贵族集团的手里。国君的废立全由他们作主，经常发生争夺君位的内乱。国君在与奴隶主贵族的尖锐冲突中，迫切需要寻求一定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秦国的地主阶级，正是在奴隶制统治的这个薄弱环节中找到了缺口，逐步地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公元前四〇八年，秦国实行“初租禾”<sup>⑤</sup>。这表明秦国地主阶级的存在得到了合法承认。公元前三八四年，秦献公开始取消残暴的奴隶制的殉葬制度，即所谓“止从死”<sup>⑥</sup>。过了十年，秦献公又采取了“户籍相伍”<sup>⑦</sup>的新制度。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反映。秦孝公作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急切地希望“变法以治”<sup>⑧</sup>。他一即位，就颁布命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sup>⑨</sup>

究竟按照什么政治路线实行变革呢？秦国由于位处偏僻的雍州之地，不得参与中原诸侯国的“会盟”<sup>⑩</sup>，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统治比较薄弱，拿不出什么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西行不到秦”<sup>⑪</sup>。这说明儒家当时在秦国的影响比较微弱，远不如在中原地区的广泛而强大。因此，秦国的国君直率地认为应当采取同孔子思想相反的政治路线：“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sup>⑫</sup>。用了孔子的一套就会亡国，这是对于当时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

商鞅，卫国人，原名公孙鞅，是李悝的学生，是个“好刑名之学”<sup>⑬</sup>的法家。



他从卫国跑到了秦国，虽然受到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欢迎，但也遭到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对。当时，在秦国朝廷上发生了一场大争论。秦国旧贵族的政治代表甘龙和杜挚，妄图按照儒家的路线改造秦国，叫嚷“法古无过，循礼无邪”<sup>⑭</sup>，竭力主张维护奴隶制的“礼治”局面。商鞅驳斥这种传统的奴隶主思想是“世俗之言”，说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sup>⑮</sup>，竭力提倡变革。在这场地主阶级革新派与奴隶主贵族保守派的激烈争论中，秦孝公坚定地支持了商鞅的主张，确定了变法的路线。从公元前三五六年开始，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如“开阡陌封疆”<sup>⑯</sup>，奖励地主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推广“民为什伍”<sup>⑰</sup>的连坐法，实行县制，以及统一度量衡制度等等。商鞅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竭力倡导“僇力本业”<sup>⑱</sup>，即要求努力从事耕织，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sup>⑲</sup>。他在变法中特别规定：凡是“耕织致粟帛多者”可以“复其身”（免除本身的赋役）。相反，如果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sup>⑳</sup>，就要连同他的妻子没为官奴婢。这种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沉重地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势力。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必然要受到旧贵族反动势力的顽抗。商鞅变法的时候，秦国的京都里“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宗室贵戚多怨望者”<sup>㉑</sup>。贵族奴隶主胆战心悸，咬牙切齿，“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sup>㉒</sup>，“畜怨积讎比于丘山”<sup>㉓</sup>。他们纷纷聚集在公子虔的旗帜下，唆使太子“犯法”，竭力阻挠变法的实行。商鞅面对着这种“法之不行，自于贵戚”<sup>㉔</sup>的局面，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对宗族奴隶主集团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他对公子虔处以割鼻的重刑，罚唆使太子犯法的公孙贾面上刺字，杀了破坏变法的贵族祝懣。商鞅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在咸阳附近的渭水边上镇压了七百多个旧贵族，维护和巩固了新的封建制度。据记载，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sup>㉕</sup>，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sup>㉖</sup>。当章太炎早年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时候，就曾正确地评论了商鞅，说：“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sup>㉗</sup>

秦国的宗族奴隶主集团在经受了猛烈的打击后，转入地下活动，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但背地里却在日夜酝酿阴谋，妄图复辟。商鞅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摆脱不了那个阶级所特有的局限性和软弱性。他虽然意识到斗争的严重性，



但他根本不可能依靠人民，就是对于地主阶级的力量也缺少足够的估计和广泛的动员。他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变法路线。因此，当秦孝公一死，商鞅的变法就搞不下去了。特别当那个和旧贵族站在一个阵线上的太子——秦惠王上台以后，以公子虔为首的复辟势力立刻进行反攻倒算，“告商君欲反”<sup>②③</sup>。公元前三三八年，贵族奴隶主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商鞅。

商鞅死后，复辟的逆流一度统治了秦国。秦惠王推行了一条与商鞅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排斥法家而信用旧贵族。秦惠王有个舅子名叫魏珪，后封于穰，称为穰侯。他是惠王、武王、昭王三朝的“元老”，经济上“富于王室”，政治上“威振秦国”<sup>②④</sup>。穰侯竭力迫害法家，把来自韩、赵、魏等国的地主阶级谋士，一律斥之为“徒乱人国”<sup>②⑤</sup>，充分暴露了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本性。

在这个时候，中原各诸侯国也同时出现了一股反对法家的逆流。商鞅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引起了各国奴隶主的惊慌与恐惧。他们把秦国看作是“不识礼义”、“好利而无信”的“虎狼”之国<sup>②⑥</sup>。在这场对法家的围剿中充当急先锋的，是儒家的孟轲。儒家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反动的思潮和学派，它的创始人孔丘就是一个顽固的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终生为维护奴隶制统治而奔走呼号。孟轲继承了孔丘的反动事业，公开反对取消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保存“世臣”、“世禄”<sup>②⑦</sup>制度，叫嚷“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sup>②⑧</sup>，即不准触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他同孔子杀少正卯一样，咒骂法家是“民贼”<sup>②⑨</sup>，要求严厉镇压。商鞅“决裂阡陌”<sup>③①</sup>，“墾经界”<sup>③②</sup>，废除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孟子大讲“仁政，必自经界始”<sup>③③</sup>，妄图恢复早已分崩离析的“井田”制。商鞅提倡“耕战”政策，鼓励新兴地主阶级通过“辟田与胜敌”<sup>③④</sup>的途径而改变社会地位。孟子则抛出“恒产”论，说什么“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sup>③⑤</sup>，主张对“辟草莱”者处刑<sup>③⑥</sup>。商鞅主张“法治”；孟子则鼓吹“王道”“仁义”。孟子的政治经济主张是商鞅变法的一种反动，完全适应了贵族奴隶主的复辟需要。

但是，封建制度终究要代替奴隶制，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秦国内外反动派的复辟活动都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韩非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sup>④①</sup>。这话说得不错。秦国在废除“井田”制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和发展，犹如潮水一样不可阻挡。据记载，“秦惠王并巴



中，……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sup>④②</sup>这是典型的封建赋税的剥削形式。到了秦昭王时期，秦国不仅关中地区农业发达，就连边远的蜀地也是“沃野千里”，有“天府”<sup>④③</sup>之称。这一切说明，旧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桎梏打碎以后，必然造成了新的地主经济的繁荣。

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后，新兴地主阶级日益不满于自己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力求建立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统治形式。它同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商鞅变法时期的斗争主要围绕着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那末，随着这个问题的基本解决，两个阶级的斗争就逐渐集中到政权问题上去了。秦昭王在位期间，由于魏冉等人专权，“私家富重于王室”<sup>④④</sup>。秦昭王为了夺回丧失掉的权力，和新兴地主阶级有了共同语言，逐渐倾向于法家，认识到“儒无益于人之国”<sup>④⑤</sup>。有一次，昭王生病，一些奴隶主贵族有意冒犯禁令，买牛肉为他祈祷。昭王毫不踌躇地认为“法不立，乱亡之道也”<sup>④⑥</sup>，下令每人罚盗甲两副入库。

就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范雎从魏国来到了秦国。他逃避了穰侯魏冉的搜查，在给昭王的“上书”中指出：“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sup>④⑦</sup>范雎继承和发挥了商鞅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sup>④⑧</sup>的思想，反对“世臣”、“世禄”制度。同儒家的贵族分权思想根本对立，范雎提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法家思想。他告诫昭王说：“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sup>④⑨</sup>。这就是说，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保证国君的绝对地位。范雎批判以魏冉为首的贵族奴隶主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世袭特权而搞“远攻近交”的政策，进一步提出了“远交近攻”<sup>⑤⑩</sup>的政策。范雎的路线博得了秦昭王的赞同，于是，“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sup>⑤⑪</sup>。

秦昭王任用范雎后，在对外的统一战争中连续不断地取得了胜利，从而加强了昭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秦昭王“强公室，杜私门”<sup>⑤⑫</sup>，把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等一小撮旧贵族驱逐到关外，拜范雎为相。此后，新兴地主阶级在秦国的政权机构中重又占据了优势。

但是，范雎虽然位居相位，实际上却是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在秦国，旧贵族势力当时还是相当强大的。在这种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范雎动摇了，于公元前二五六年“谢病请归相印”<sup>⑤⑬</sup>。他的后任蔡泽也只当了几个月的



秦相，就由于惧怕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攻击而主动辞职。范雎、蔡泽的下台，固然说明了他们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不敢将变法事业进行到底；同时，这也深刻地说明，在秦国地主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仍然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

## 二

在这场地主阶级与贵族奴隶主的长期、曲折、反复的斗争中，秦始皇继承了商鞅、范雎的事业，是在全中国完成了封建统一事业的雄主。

秦始皇执政以后，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秦始皇曾经采取两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步骤：其一，铲除以吕不韦为首的集团，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秦王朝的建立；其二，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这两起历史事件，是秦国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也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继续。

吕不韦并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战国末期，齐、楚等六国所用的宰相，都是宗室贵族，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楚国的令尹子兰、黄歇，赵国的赵胜等。只有秦国却大量任用客卿，任用那些在六国站不住脚而逃亡到秦国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范雎、蔡泽、李斯等。但是这时在秦国，工商奴隶主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他们成为复辟活动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秦国的乌氏倮、巴寡妇清以及蜀之卓氏等，就都有僮（奴隶）千人，富“拟于人君”。吕不韦是这股社会势力的最著名的代表。他是个“阳翟大贾”，拥有“家僮”万人，“家累千金”<sup>④</sup>，是个大奴隶主。他依靠政治投机而当上了秦庄襄王的丞相。吕不韦的上台，得到了秦国华阳夫人等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支持，是当时奴隶主阶级复辟活动的结果。

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他在经济上，激烈反对秦国传统的“强本弱末”政策，胡说“本”不是指“耕耘种植”，而是“孝”与“贤”<sup>⑤</sup>，妄图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破坏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封建农业经济。在文化思想上，吕不韦招集了一批对新制度不满的知识分子，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妄图反对与取代在秦国居于传统地位的法家思想。

《吕氏春秋》的出笼，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儒法论争的一个新动向。战国末





年，由于没落奴隶主阶级力量的日益衰落，孔孟儒家的“显学”地位早已发生了动摇，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相反地，法家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日益强大，出现了象荀况、韩非那样杰出的代表人物。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吕氏春秋》表面上标榜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实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采道家思想。儒家宣扬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动不得，道家则宣扬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无必要和不可能。两者形式虽有不同，但实质都是为了维护正在没落中的奴隶主旧贵族的统治。《吕氏春秋》是各种奴隶主阶级思想的大杂烩，它鼓吹儒家的“仁”和“义”<sup>⑥</sup>，又夹杂进无为而治之类的思想，根本目的是想倒退复古，恢复儒家所主张的奴隶制度。

秦始皇一登位，便面临着一场与以吕不韦为首的贵族奴隶主集团的严重斗争。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很自然地找到了韩非的法家思想作为反复辟的思想武器。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据记载，当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以后，曾经感叹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sup>⑦</sup>秦始皇在亲政后的第二年，根据韩非“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sup>⑧</sup>的原则，实行“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sup>⑨</sup>的政策，罢了吕不韦的官。吕不韦罢官后，死不改悔，继续与六国旧贵族秘密串连，阴谋发动叛乱。事发后，于公元前二三五年畏罪自杀。吕不韦这股势力的消灭，标志着秦国地主阶级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此后只过了十几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就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巨大胜利，也是法家思想的巨大胜利。它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奴隶社会而进入了封建社会。

“焚书坑儒”的起因，是关于究竟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的论战。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在这个事件中，代表贵族奴隶主利益的是那批坚持孔学的儒生。

在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国奴隶主贵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力量已经基本上垮台了。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由于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还具有相当大的力量。根据历史记载：在朝廷中的博士七十人中，有不少人是儒者；在地方上的，著名的儒者就有孔鲋、张耳、陈余等人。这些人中的有一部



分，对新制度极端不满，挑起了秦朝向何处去的新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首先跳出来的是丞相王绾。他站在贵族奴隶主的立场上，建议恢复分封制。廷尉李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开倒车，指出如果恢复分封制，诸侯“相攻击如仇讎”<sup>⑩</sup>，必然会恢复到过去奴隶社会的分裂和混战局面。秦始皇总结了秦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赞同了李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见，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坚决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sup>⑪</sup>，由中央派出官吏进行统治，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但是，被推翻的阶级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奴隶主通过秦王朝政权机构中的代理人，继续制造舆论，攻击郡县制。公元前二一三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跳出来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sup>⑫</sup>，明目张胆地鼓吹复辟殷周时代的奴隶制。于是，重又在朝廷上掀起了一场新的大辩论。

在这场论争中，李斯坚决驳斥了儒家“以古非今”的理论，强调“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sup>⑬</sup>，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他还指出：“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sup>⑭</sup>，这是在制造复辟的舆论，应当实行镇压。他指出儒家以“私学”相标榜，“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sup>⑮</sup>，这样下去，势必会威胁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诗书百家之语”，不准“道古以害今”，“别黑白而定一尊”<sup>⑯</sup>。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在面临即将全部覆灭的情况下，进行了垂死的挣扎活动。以卢生、侯生为代表的儒生，竭力诽谤“法治”是“乐以刑杀为威”，攻击中央集权是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sup>⑰</sup>，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对这些从事奴隶制复辟活动的反动儒生实行了镇压，在咸阳“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

国家机器从来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焚书坑儒”是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当时新建立的政权所必须采取的专政措施。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早在秦孝公当政的时候，商鞅为了巩固变法的





成果，就曾提出过“燔诗书而明法令”<sup>⑧</sup>的主张。法家韩非在同儒家的辩论中，更提出了“散其党”<sup>⑨</sup>的主张。但是，秦始皇以前的历代国君，由于当时斗争的重点在于政治、经济领域，思想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不如秦始皇时候那样地尖锐、突出，因此，没有对儒家思想从法律上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秦始皇的实行“焚书坑儒”政策，是在总结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经验后，才逐步认识到了“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sup>⑩</sup>的道理。

由上可知，“焚书坑儒”事件的爆发，并不是由于秦始皇的天性“残暴”，而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秦始皇“好文过于余主”，并不是“必以文学为戮”。在秦朝的七十个博士中，单是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有八人未曾被坑，其中有的人虽持有不同的政见，但由于没有在背后搞阴谋活动，照样可以“优游论著”<sup>⑪</sup>。

但是，那些顽固坚持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儒生与一般儒生不同，他们在地 下刮阴风、点阴火，对新的封建政权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是儒生中的极右分子。如果不对他们实行严厉的镇压，就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国家政权，从而引起整个中国向奴隶社会的大倒退。因此，“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在贵族奴隶主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阶级自卫措施，是历史上一次维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大都对这个革命行动采取了欢呼的态度。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sup>⑫</sup>明代的儒家叛逆者李贽歌颂秦始皇是“千古一帝”<sup>⑬</sup>。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则直率地认为秦始皇“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腑”，“不妄诛一吏”；如果秦朝继任者得人，“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sup>⑭</sup>。而历代的反动派，直到刘少奇、林彪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代理人，都是咒骂秦始皇和吹捧儒家的。历史的事实说明了如何评价秦始皇、如何评价孔子，始终是思想领域中一场长期的阶级斗争。

### 三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



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地主阶级统治者从尊法反儒转化为尊儒反法，是同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地主阶级从革命者变成反动派、从先进者变成落后者的历史转变过程相适应的。

秦王朝是历史上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这个剥削阶级在当时刚取得政权不久，由于缺乏统治的经验，激化了它同农民的阶级矛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最后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历史前进，显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这种情况，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指出的：“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王朝在建立的过程中，也曾经继续发生过究竟是坚持前进的封建制还是倒退回落后的奴隶制的争论。儒生郅食其就曾经劝刘邦实行分封制，甚至连分封诸侯的印也都刻好了。但在张良的劝阻下，刘邦终于醒悟过来，认识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气愤地骂郅食其说：“竖儒，几败而公事！”<sup>⑥</sup>

秦朝的制度为汉朝所继承下来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吴楚七国之乱被镇压下去了，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过去了，一开始就存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这时的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失去了当年作为一个进步阶级的生气勃勃的革命性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虚伪的保守的劝人安分守己的儒家思想，比起直率地宣传地主阶级专政、提倡变革的法家思想来，要更有利于封建统治。于是，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从此，经过改造了的儒家学说转而为地主阶级新主子服务，孔学成了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综观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可以看到，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要经过曲折的道路，其间充满着流血和牺牲，还可能出现暂时的倒退和局部的复辟。但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新的社会制度终究要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秦始皇虽然早已死了，但他的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唐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sup>⑦</sup>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指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sup>⑧</sup>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今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并正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同样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更加坚信这个真理。秦始皇尽管遭到古今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林彪之流的谩骂，但自有其历史的功绩。他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法家思想的彻底的有成效的实践者，是建立和维护中国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注：

- |                          |                   |
|--------------------------|-------------------|
| ① 贾谊：《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 ③⑥ 《通典·食货(一)》     |
| ② 《后汉书·班彪列传》             | ③⑦③⑨ 《孟子·滕文公上》    |
| ③⑥⑧ 《韩非子·和氏》             | ③⑧ 《通典·选举(一)》     |
| ④ 《汉书·贾谊传》注：“跖，秦大盗也。”    | ④① 《韩非子·定法》       |
| ⑤ 《史记·六国年表》              | ④②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
| ⑥⑨⑩②④ 《史记·秦本纪》           | ④③ 《华阳国志·蜀志》      |
| ⑦⑩⑪⑫⑬⑭⑮⑯⑰ 《史记·秦始皇本纪》     | ④⑤ 《荀子·儒效》        |
| ⑧ 《商君书·更法》               | ④⑥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
| ⑪ 韩愈：《石鼓歌》               | ④⑦ 《史记·李斯列传》      |
| ⑫ 《列子·说符》                | ④⑧ 《史记·吕不韦列传》     |
|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史记·商君列传》   | ④⑨ 《吕氏春秋》卷十四      |
| ⑲ 《商君书·农战》               | ④⑩ 《吕氏春秋》卷二十一、十九  |
| ㉕ 《盐铁论·非鞅》               | ④⑪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
| ㉖ 刘向：《新序》，见《史记·商君列传》“集解” | ④⑫ 《韩非子·有度》       |
| ㉗ 《战国策·秦策(一)》            | ④⑬ 《韩非子·显学》       |
| ㉘ 章太炎：《诂书·商鞅》            | ④⑭ 《韩非子·诡使》       |
| ㉙ 《史记·穰侯列传》              | ④⑮⑯ 章太炎：《秦献记》     |
| ㉚⑳㉛㉜㉝㉞㉟㊱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 ④⑰ 李白：诗《秦王扫六合》    |
| ㊲ 《战国策·魏策(三)》            | ④⑱ 李贽：《藏书·卷二目录》   |
| ㊳ 《孟子·梁惠王下》              | ④⑲ 章太炎：《秦政记》      |
| ㊴④④ 《孟子·离娄上》             | ④⑳ 《史记·留侯世家》      |
| ㊵ 《孟子·告子下》               | ④㉑ 柳宗元：《封建论》      |
|                          | ④㉒ 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 |



# 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劲 云 戈

孔子死去已经有二千四百多年了。但是，从汉朝开始，历代王朝、北洋军阀、蒋介石反动派，都捧他为“圣人”。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的。五四运动时期曾经批判过尊孔思想的陈独秀，当他搞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后，就叫嚣要“重新评定”孔子的“价值”，说什么孔子的“价值”在于“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吹捧孔孟是“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瞿秋白曾经搞过“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当他向蒋介石屈膝投降写《多余的话》时，就承认他自己“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有“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王明、刘少奇都是尊孔的。彭德怀也不绝口地宣扬孔子的“忠恕之道”。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在背地里装模作样地谈论“忠恕”和“仁义”，甚至在阴谋炮制反革命政变计划时也不忘写上一句“不成功便成仁”。他们是信古好古、装潢门面吗？不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他们抬出孔子的亡灵，借用孔子的名字、口号、语言和服装，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

孔子是没落的贵族奴隶主的后代，生活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末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是为了阻止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妄图把社会拉向后退。现在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革命，竭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当代的



中国社会拉向后退。因此，他们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就是很自然的了。

## (一)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目标就是“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已经出现以后，孔子以复辟西周贵族奴隶制度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这无疑是反动的。孔子施行“仁”的方法是“忠恕”，而“仁”的标准和限度则是“中庸”。所谓“忠恕”，孔子曾简单地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所谓“中庸”，就是不要“过”和“不及”。孔子对“仁”，还有“爱人”、“泛爱众”等欺骗性解释，来掩盖其爱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本质。孔子的这些反动论调，适应了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需要，被他们吸收和发挥为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们用以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这方面，王明是突出的一个。

叛徒、卖国贼王明，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是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对孔子思想不进行阶级分析，反而跟在蒋介石屁股后边宣扬“孔孟之道”是什么“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他胡说孔子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种用剥削阶级的思想、传统、道德来冒充全民族的思想、传统、道德，正是孔子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的反动伎俩。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在政治上必然走上投降主义道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竭力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反对划分左、中、右，混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阶级界限，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回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去。积极推行王明路线的彭德怀，很懂得王明这一套的来路，他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却跳出来大讲孔子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彭德怀鼓吹这一套，就是不准中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



不准革命人民起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明奉苏修主子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华旨意，配合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活动，又重新祭起“尊孔”的破旗。他恶毒咒骂秦始皇镇压奴隶主复辟的“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充分表现了他仇恨一切进步措施的反动立场。

## (二)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唯心论的先验论者。孔子要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主张从“克己”做起，即要奴隶主们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多少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他又很相信“天命”，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天”赋予的。因此，孔子和他的学派特别强调“修养”和内省的工夫，即所谓“慎独”。他们要人们不去接触外界，只要关门修养就能使人从心灵深处体验出“天”所赋予的先验的知识和德性。这完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一套。为了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以适应地主资产阶级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叛徒刘少奇把孔子及其学派的“修养”，搬到共产党内来。

刘少奇也是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早年被捕叛变，捧着反动军阀赏赐给他的“四书”，从敌人狗洞里钻出来又重新混进党内。他早就是一个尊孔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鼓吹说：“孔子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到今天还有其合理的因素”，“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有用”，“应该充分利用它”。刘少奇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把反动说成“进步”。他所指的所谓“合理因素”和“有用”的部分，并且要加以“利用”的，就是孔子及其学派的唯心主义的“修养”。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出版的黑《修养》，就是刘少奇利用孔子思想破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杰作”。在这本黑书里，刘少奇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是大量引用孔子及其门徒关于“修养”方面的话，号召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向这些复辟奴隶制度的“圣贤”学习唯心主义的“修养”经。他要求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讲孔子的“忠恕之道”，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体贴人家，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在刘少奇看来，“逆来顺受”才算得上实行了孔子的“忠恕之道”，才算有了“修养”。在黑《修养》中，刘少奇妄图利用孔子思想，按照他自己对待敌人屈膝投降的叛徒面貌，来改造我们





的党员。他妄想否定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深刻阐明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毛主席所培育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成为实行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机会主义政党，从而破坏中国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又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要把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统统交给国民党，实行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刘少奇要我们放弃武装斗争，就是妄图把我们党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样只进行“议会”斗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把我们的党员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不搞革命战争、不要武装夺取政权的“议会迷”。

一九四九年，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即将在全国建立的时候，刘少奇又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一九六二年，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特别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刘少奇再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在这两个版本里，刘少奇继续发挥其尊孔思想，而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权和为将来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问题时，却连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也没有用。在引用列宁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两段语录中，刘少奇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及有关对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论述，都有意地删去了。对照他的另一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其反对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用心，就一目了然。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下，召开了一次疯狂吹捧孔子的黑会，竭力煽起尊孔的黑风。刘少奇在天津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说，“要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他还要革命人民“要有很大的气量去容忍一切无理的事情，不要斤斤在意气上计较”。这实质上就是不许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是什么没有“气量”啦，什么在“意气上计较”啦，就是没有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了。总之，刘少奇就是要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孔子的所谓“仁政”，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黑《修养》的要害。

孔子有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的“忠恕之道”，刘少奇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张，刘少奇就有“驯服工具论”和“群众落后论”；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谬论，刘少奇就有“入党做官论”和“公私溶化论”。



很奇怪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杰出地完成了”把孔孟思想“重新塑造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任务”。刘少奇就是妄图利用孔子思想腐蚀和毒害我们的党员，使我们党员越“养”越“修”，使我们马列主义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从而使整个党和国家都改变颜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黑《修养》，批判了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沉重打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罪恶企图。

### (三)

孔子言必称周公、文王，说他们是天生的“圣人”，是“生而知之”的特殊天才，非常崇拜他们。至于他自己，有时虽然也说是“学而知之”者，但实际上他标榜自己也是象周公、文王那样的“天才”。他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孔子梦想把当时社会拉回到西周天子的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中去，造成他所谓的“天下有道”的政治局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就是要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到承天命的奴隶主贵族的总头目手中。他又特别强调贵族奴隶主的等级制度，严格划分治人的“君子”和治于人的“小人”、“上知”和“下愚”的界限。为了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即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统治，孔子大力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维护奴隶制度的人，形成一个以复辟奴隶制度为宗旨的学派或集团，并亲自率领他们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反动政治主张，寻找一个可以把它付诸实践的机会，甚至支持并准备亲自参加被他视为有利于复辟奴隶制度和打击新兴地主势力的地方叛乱。由于孔子这种对抗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行径，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只能到处碰壁。当时就有人批判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孔子的这些反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后来被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地主阶级吸收和发展为封建帝王的“天人合一”、“王权天授”的反动政治理论。

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也是尊孔派。他吹捧孔子的反动政治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疯狂地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正义措施，而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辩护。林彪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来自



孔子的“生而知之”、“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谬论。林彪混进革命队伍以后，顽固地坚持剥削阶级世界观，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林彪同刘少奇一样，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效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在背地里攻击我们对被赶下台的反动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讲“忠恕”，是“做绝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驳斥主张对敌人施“仁政”的孔孟之徒时指出：“‘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坚持了毛主席这一条原则，才保证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林彪的咒骂，只是暴露出他自己是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代理人。

林彪继承了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衣钵，大力宣扬从周朝以来的几千年的政变史，蓄谋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方法，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建立一个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林彪按照孔子唯心论的先验论，把他自己和他的儿子，打扮成什么“超天才”。他和他的死党利用各种形式“大树特树”林家父子的“绝对权威”，为建立林家父子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还网罗了一小撮反革命死党，结成一个阴谋集团，并建立武装特务组织。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林彪的指使下，这一小撮反革命死党又炮制了一个《“571工程”纪要》，精心策划了一个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但是，林彪同历史上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一样，在人民群众中极其孤立，因而他们的阴谋计划必然遭到彻底失败。他们叫喊“不成功便成仁”，实际上是夜过坟场吹口哨，给自己几个死党壮胆，作垂死的挣扎罢了。林彪反党集团永远也“成”不了“仁”，请出孔子的亡灵和主义，也无法挽救他们彻底败亡的命运，就因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子的倒行逆施一样，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我们党内企图借用孔子的亡灵来达到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更加清楚地说明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们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

孙 文 光

十八世纪中叶，我国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小说。鲁迅曾经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是，这部杰出的作品自问世以来，它的思想意义，并没有真正被人们所认识。那些所谓新、旧“红学家”们，从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用穿凿附会的索隐和烦琐荒谬的考证，极力歪曲、抹煞《红楼梦》的历史内容和社会意义。

一九五四年十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对《红楼梦》研究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深刻地、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陆定一、周扬之流“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罪行，号召开展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这场斗争，拨开了笼罩在《红楼梦》上的重重迷雾，指明了《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方向。但是，刘少奇、周扬一伙却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对这场斗争进行干扰和破坏。他们公然继承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衣钵，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贩卖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胡说《红楼梦》写的是什么超阶级的“男女恋爱主题”。有的人在评论文章里，连篇累牍，变本加厉地宣扬什么“永恒主题”和“共名”说，几乎把《红楼梦》说成了人性论的文艺标本。这种反动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对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莫大歪曲。

《红楼梦》是不是一部写“男女恋爱主题”的书呢？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红楼梦》所表现的是以社会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政治主题，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曹雪芹亲身经历过封建贵族家庭由鼎盛而极衰的变迁，看出了整



个封建贵族阶级“树倒猢猻散”的覆灭命运，怀着“无才补天”的惭愧，通过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描绘，生动地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现实。它写的并不是一朝一代的历史实事，却深刻地表现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尽管曹雪芹曾幻想“补”封建社会之“天”，也不可能具备自觉的阶级观点，但是，由于他有了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笔下的《红楼梦》，终究触及到当时社会政治的大量黑暗现象，为我们提供了封建社会末期广阔的阶级斗争画面。所以，我们说这部小说是一部形象化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我们应当把它当作历史去读，而不能看作是一部爱情小说。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曹雪芹就以深恶痛绝的态度，严肃地批判了过去的才子佳人作品：“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这种批判，正是把《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和那些“淫滥”的才子佳人作品划清了界限。特别是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一节文字，提纲挈领，笼括全书，更加明确地点明了《红楼梦》的主要内容。这节文字，不仅交代了四大封建家族重要成员的出场，而且通过葫芦僧对“护官符”的解说，把笔锋引向当时整个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对它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葫芦僧向贾雨村递交的应天府“俗谚口碑”：“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表面上是介绍四大封建家族的豪华富贵和声势显赫，但实际上则揭示它们是一个腐朽的、寄生的封建贵族集团。而这类封建贵族集团，“各省皆然”。就是说，并非一省一地之事，而是普遍现象。“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这节文字虽然只写了当时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写了薛蟠打死冯渊这一条人命，但却为全书展示四大封建家族勾结起来，制造更多这样的悲剧，揭开了序幕。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全书的总纲，是阅读和理解《红楼梦》的一把钥匙。从这里入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部描写四百多个男女人物和错综复杂矛盾的小说的中心内容，看到曹雪芹在表现政治主题方面所倾注的心血。

《红楼梦》产生于清王朝所谓“乾隆盛世”。这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这一时期，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河清海晏”，天



下太平。但在这“太平”景象的背后，却是危机四伏，民不聊生，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处于总崩溃的前夜。在曹雪芹逝世后不到八十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封建制度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开始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到了一八五一年，则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所谓“乾隆盛世”，只不过是这个衰老的封建社会在覆灭之前的回光返照。《红楼梦》所反映的正是封建社会行将总崩溃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趋势。由于曹雪芹阶级和生活的局限，对农村情形不很熟悉，他很少直接描写农村生活。但小说中不少地方仍然直接或间接地透露出，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影响着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第一回写甄士隐家遭火烧后，曾计议到田庄上去住，但“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贼盗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他只得将田地都变卖了，投靠到岳丈家去。这说明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整个封建统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正如第二回中古董商冷子兴在演说荣国府时说的：“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可以看成是对那个时代的生动概括。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红楼梦》选择以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作为描写对象，是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的。毛主席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红楼梦》中四大家族，和其他类似的封建贵族集团扭结在一块，正是十八世纪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和支柱。其中，贾府更有其代表性。这个“功名奕世，富贵流传”的百年望族和皇亲国戚，它从政治、经济和家族血缘关系等各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四大家族之间的紧密勾结和共同利益。在贾府的围墙内，最高统治者贾母是侯门史家的代表，管家的王夫人和王熙凤是九省都检点王家的代表，薛宝钗和她的母亲薛姨妈是皇商薛家的代表。他们“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贵族集团上通朝廷，下结州县，同整个封建王朝的命运生死攸关。小说围绕着贾府开展的种种矛盾，实际上就是当时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缩影。

在那“诗礼簪缨”、“温柔富贵”的贾府，鲜明地体现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关系。以贾母、贾政、贾赦、王夫人、贾珍、贾琏、凤姐等为代表的一小撮地





主阶级统治者，或道貌岸然，或荒淫无耻，统统都对被压迫阶级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人身迫害，对本阶级的叛逆进行无情摧残和镇压。而众多出身底层的奴仆，却毕生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每个人都有着一本血泪账。他们有的是世代为奴的“家生子”，有的是被抢占来的丫头；有的是廉价拐买来的，有的是由其他贵族当作牲口转送的。总之，每个人都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受尽了封建主子们的折磨和蹂躏。在这里，一小撮封建贵族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一餐饭就要吃去几十两银子，一碗菜要十几只鸡作原料。用刘老老的话说，他们一席“螃蟹宴”就够“庄家人过一年了”。为了元春当贵妃之后回家省亲，他们大兴土木，修建大观园，极尽“太平景象，富贵风流”，连元春也不得不说：“太奢华过费了！”他们甚至花几万两银子派人“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自己办起戏班子，寻欢作乐。这一小撮统治者如此恣意享乐，对受剥削的农民来说正是意味着莫大的灾难。第五十三回写黑山村庄头乌进孝在灾年向贾府缴租，账单上写的货币和实物已经够吓人的了，可是，贾珍还不满足：“这够做什么的？”“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他们敲诈勒索，高利盘剥：王熙凤为了积攒“体己”，竟挪扣奴隶们的“月钱”去放高利贷，一年不到，就赚了成千两的银子。到贾府被抄时，单她放债这项私房钱，即不下“五七万金”。而皇商薛家，领着“内帑钱粮”不算，还大开当铺进行搜刮。可以想见，不知有多少贫苦人民在他们的巧取豪夺下倾家荡产。

《红楼梦》描绘的四大封建家族衰亡的历史，时间不过几年。在这短暂的岁月里，明确交代的死亡人数就有四十七个，而直接受四大家族残害的和死于不合理封建制度的人命即有三十五条。封建贵族统治者的手上，无一不沾满了奴隶们和无辜受害者的鲜血。试看，曹雪芹在前八十回里，就描写了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人命事件：

“金陵一霸”薛家的花花公子薛蟠，倚财仗势，抢占民女，打死冯渊。偌大的人命官司，“他却视为儿戏，自谓花上几个钱，没有不了的”，竟同着母亲、妹子扬长而去。冯家告了一年的状，结果让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

阴险毒辣的王熙凤，为了捞取三千两银子的外快，她仅凭一纸书信，勾通节



度使云光，一下子断送了张金哥未婚夫妻二人的性命。作者说，这样的惨事“不可胜数”，就是说，王熙凤有数不清的血债。

腐朽透顶的贾赦，故作风雅，看中了石呆子家藏的二十把古扇子，人家不给，就和贾雨村串通一气，“讹他拖欠官银”，不但抄去了扇子，还弄得石呆子家破人亡。

衣冠禽兽的贾珍、贾蓉父子和贾琏、王熙凤夫妇，狼狈为奸，百般欺骗、折磨尤二姐和尤三姐，致使尤家姐妹不堪凌辱，双双含愤自杀。

一向以“菩萨面孔”出现的王夫人，平日里满嘴“仁义道德”，但在虐杀人命方面，同其他凶相毕露的封建主子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在一巴掌迫使金钊儿投井而亡之后，紧接着又在抄检大观园的事件中大打出手，亲自撵走了四儿、司棋、入画，逼得芳官、蕊官、藕官等出家，并将“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晴雯赶出大观园，致使这个不屈的女奴含冤而死。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人命案，生动地说明：那“诗礼簪缨”之族，只不过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地狱；那“钟鸣鼎食”之家，只不过是“人肉筵宴”的鬼窟；那封建统治者信奉的孔孟之道，只不过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然而，横遭惨死的岂止是这有名有姓的几个，在那用劳动人民血汗建筑起来的大观园里，实际上无处不印染着奴隶们的斑斑血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大观园里的奴隶们不止有饮泣吞声的怨愤，而且有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晴雯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这个自幼孤苦伶仃、连姓什么也不知道的奴隶，浑身迸发着反封建压迫的锋芒，即使在生命奄奄的时候，也没有向封建统治者低头屈服。

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基本上完成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是他的成绩。但书中有不少地方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暴露了他思想落后与反动的一面，艺术水平也不如曹雪芹。正如鲁迅所指出：“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芬’，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中国小说史略》）高鹗着力描写了林黛玉之死，进一步表明：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人肉筵宴”上，被吃掉的不止是那些出身低微的奴隶，即使先前被贾母称作“心肝儿肉”的亲外孙女也不能幸免。他还写了直接死于四大家族之手的鸳鸯、司



棋、潘又安和张三；写了死于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元春、迎春等人的结局。这些都有助于揭示封建制度横暴凶残的吃人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共产党宣言》）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精细的笔触，描写了四大家族内部的兄弟之间、婆媳之间、夫妇之间、妯娌之间、嫡庶之间、叔侄之间的尖锐矛盾，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瓦解过程，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历史命运。贾府的统治者内部，表面上罩着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骨子里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种矛盾的焦点，是在争夺贾府的财产和权力。贾府内部有两大派系，一派以王夫人为首，包括凤姐、薛宝钗等，并有贾母为后台，为了四大家族的共同利益，极力巩固自己在贾府的统治地位；另一派是以邢夫人为首，包括尤氏以及赵姨娘等，代表异姓弱族的利益，则企图夺取王夫人、凤姐手中的权力。《红楼梦》多次描绘了这种争权夺利的冲突。当然，不论哪一派取得胜利，都无法挽回贾府一步一步走向衰亡的颓势，这种冲突倒是加速了这个封建大家族的崩溃进程。贾府最精明的小姐探春就曾惊呼：“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要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探春这番话，道出了封建贵族阶级加速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在压迫众多出身微贱的奴仆和迫害本阶级的叛逆上，无论饱食终日的贾母，还是道貌岸然的贾政；无论“宽厚仁慈”的王夫人，还是“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凤姐，都无一例外地结成了反动的“神圣同盟”，顽固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们在道德方面的表现，更是腐朽堕落，糜烂不堪，充分地显示出封建地主阶级面临末日的疯狂。焦大曾经直言不讳地破口大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红楼梦》从多方面为我们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反映了大观园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任何企图把它歪曲成为单纯的爱情小说的奇谈怪论，都是



改变不了这部小说的客观实际的。

对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问题，我们也应该用阶级观点来分析。曹雪芹以较多的笔墨描写了宝、黛这一对封建礼教叛逆者的爱情，目的是在于通过他们同封建统治者的尖锐冲突，揭示贾母、王夫人、凤姐为安排“金玉良缘”所玩弄的政治图谋。恩格斯深刻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宝、黛的爱情，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同封建统治者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贾宝玉和林黛玉虽是嫡亲姑表兄妹，但由于林黛玉并不属于四大家族，而且家庭早已破落，贾府的统治者为了家世的利益，就必然地要选中四大家族理想的继承人薛宝钗，用“金玉良缘”去代替“木石前盟”。百万皇商的薛姨妈，也正想通过与贾府的联姻，进一步攀附贾、王两大家族，为自己去寻找政治靠山。而尤为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宝、黛这对叛逆者的爱情，包含着反对封建礼教的政治内容，这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更是决不能容忍的事情。当贾宝玉还在“内帏厮混”的时候，贾府的统治者就忧虑这“古今不肖无双”的子弟，“于国于家无望”，巴望他能够改“邪”归“正”，继承祖业。但是贾宝玉在林黛玉的支持下，反对儒家思想，反对封建礼教，反对仕途经济，反对男尊女卑，在反抗封建正统思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当然要引起封建统治者更大的恐惧和不安，促使他们不择手段地把薛宝钗这个自觉而坚决维护封建秩序的淑女抬出来，通过配偶关系，箝制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发展，借以延续“一代不如一代”的贵族阶级的寿命。非常清楚，曹雪芹笔下的宝、黛爱情悲剧，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从属全书政治主题的有机组成部分。

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封建贵族家庭叛逆者的典型，决不是什么超时代、超阶级的“共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贾宝玉在大观园那个特殊环境里生活，使他有机会了解到被压迫的奴隶们的不幸，看到封建贵族的罪恶和无可挽回的颓势。如同鲁迅所指出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正是由于贾宝玉有了这种难能可贵的感受，他才可能在腐朽的封建势力面前不肯就范，并且成了封建



贵族的叛逆者。然而，贾宝玉又毕竟是一个“富贵闲人”，他浓厚的虚无思想，对君权、亲权的保留态度，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特有的其他恶劣的品性、习气，都表明他性格的消极一面，这是应当批判的。有的人对此却以欣赏的态度，津津乐道地宣扬：“在这一人物的典型性格里，不仅含有那一时代所提供出来的东西，而且含有全人类的、能够打动各个时代人们心灵的东西。”这种论调，简直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贾宝玉被贾府的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尤为贾政所不容，几欲置之于死地。他连自己的亲属也不能打动，又怎能谈得上打动“全人类”、打动“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灵呢？林黛玉虽不属于四大家族，但她的性格里并不是没有“阶级的尘屑”。她不满意封建的礼教和婚姻制度，不满意封建家庭的包办，对“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感到痛苦和愤恨，但又幻想能有一个家长出面为她主持“终身大事”。她多愁善感，孤高自许，这些特点固然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她的生活境遇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由她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鲁迅说过：“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这段话，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说得是何等精辟！然而有的评论者不仅把林黛玉说成是“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共感、所激动”的超阶级的艺术形象，而且说什么“这个少女的敏感、‘小性儿’、‘尖酸刻薄’等等，不是把我们和她拉远，而是反而靠近了”，甚至还呼喊：“让我们为林黛玉鸣起心里的音乐！”如此声嘶力竭地向封建时代的贵族少女顶礼膜拜，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要把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和读者引向何方？

《红楼梦》从问世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世纪了。在研究《红楼梦》问题上的斗争，也几乎同时进行了两百多年。从旧红学派、新红学派到“男女恋爱主题”的反动滥调，都无一例外地贯串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掩盖了《红楼梦》的真面目。今天，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指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正确评价《红楼梦》，让广大青年和读者从这部形象化的封建社会百科全书中得到有益的历史知识，从而有助于参加当前的现实斗争。



## 思 想 评 论

# 人类在战胜异常气候中前进

上海市气象局写作组

近年来，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气候异常。这件事引起了世界上各种人物的议论。国外有些资产阶级报刊甚至公开宣扬：“气候良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小冰河时期即将到来，世界将进入一个缺粮的时代”。一句话，人类的前景简直可怕极了。

人类难道真的会回到洪水猛兽的时代去吗？否。

气候异常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气候的正常与异常，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有异常，才有正常；没有正常，也就无所谓异常。正常，是指气候的变化比较合乎常“规”，适合于人类的生活和农作物的生长。但事实上，气候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绝不可能是年年如此。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天在变，地在变，气候也在变。正常是暂时的、相对的，异常倒是经常的、绝对的。天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基督教的伊甸园和佛教的极乐净土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地球上不可能永远遍地绿茵、百花盛开、大树成荫。即令历史上有过那么一段传说中的黄金时代，从一部漫长的地球气候变迁史来看，那也只能是短短的一瞬间。

当前世界的气候，会不会突然发生“灾变”，一个劲儿地冷下去？决不会。冷与暖也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是由地球以及太阳系的多种因素决定





的。自从地球表面形成了大气层以后，几十亿年来，大气中冷与暖、干与湿的矛盾，无时无地不在斗争着，发展着。时而冷占优势，时而暖占优势，时而干强湿弱，时而湿进干退。冷和暖，作为一对矛盾，总是不断地向着各自的对立面转化着。现在大家公认，地球上最冷的气候，莫过于冰期了。冰期到来，冰川大发展；而冰川一发展，由于液态水变成固态冰放出了大量的潜热，再加上其他一些气候变化的因素，又会使气温升高，反过来成为使冰川融化的因素。此长彼消，相生相克。冰川的形成和发展，为冰川的衰落和结束创造了条件。冷到了极点，就要向暖的方面转化。尽管几十亿年、乃至更长时间以后，地球将随着太阳向老年转化而变冷，向另一种物质运动形态转化，但在这个时期到来以前，地球上的气候还将总是有冷有暖，冷暖交替，波浪起伏地变化发展，而不可能只冷不热或只热不冷地直线猛进。

干与湿，即降水量的多与少，和冷暖变化一样，也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相互作用，交替出现。

以上海近一百年的降水资料为例，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从一八七三年到一九七二年这一百年，大致有六个异常的降水时期：多雨（1875—1882）——少雨（1892—1898）——多雨（1912—1921）——少雨（1924—1934）——多雨（1945—1957）——少雨（1964—1972）。异常的降水时期约为正常降水年份的一倍。从多雨或少雨的每一个特定时期看，气候可以说是异常；但从多雨、少雨的相互转化、彼此交替的规律性来看，则又是正常的。可见，异常中孕育着正常，正常寓于异常之中。杞国无事忧天倾。那些惊呼世界气候将变得越来越冷的资产阶级悲观主义者，一方面对正常气候的不能常住不变感到惶恐；另一方面又用凝固不变的观点去看待今后气候变冷的趋势，缺乏“飞雪迎春到”的乐观精神。他们的思想深深地陷进了形而上学的泥坑之中。

小冰期到来怎么办？难道就此大难临头，末日来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议论小冰期何时降临人间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即使小冰川、甚至大冰川来了，也决不会断送人类的前途，相反地，倒会促使和推动世界万物乃至于人类的进步。大家知道，现在世界上的动植物共有数百万种。这样丰富多采的



生物界，就是在同异常气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气候的异常，特别是几次大冰期的出现和消失，迫使地球上的动植物跟气候作斗争，不断进行“自我改造”。气候一次又一次的变化，促成了动植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进化。例如被子植物就是气候异常的产物。在古时候，地球上植物的种子大多裸露在外，叫做“裸子植物”。后来，由于中生代气候变冷，有些植物被淘汰了，但是有些植物发生了变异，那些种子外面裹上了“被”的，有较强御寒能力的高级植物——被子植物大大发展起来。植物如此，动物又何尝不是这样！从较低级的卵生动物进化到较高级的胎生动物，同样地也是跟风云多变、灾害频袭的自然界斗争的结果。

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自己，也是在异常气候的推动下，才从动物中分化出来的。一百多万年前，气温显著下降，大冰川来临，整片整片的森林消灭了。我们的老祖宗森林古猿在树上呆不住了，只得下地来直立行走，使骨架能支撑大脑和发音器变弯。为从猿到人的转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通过劳动，又从攀援树枝的四肢中分化出了能够制造工具的手。于是，一个会思想、会说话、会制造工具的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了。人类可以说是跟最近的一次大冰川期同时诞生的。冰川是人类生长发育的摇篮。人类在它出现以来的一百多万年间，大部分是在大冰川中度过的。利用自然界的野火是人类在跟冰川斗争中学会的；钻木取火，打击燧石取火，也是在与冰川的斗争中学会的。冰川不断到来，人类不断斗争，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至于小冰期，那就更不用说了。大冰期结束以后，小冰期时断时续，从未停止。最近五百年间，地球上就又有过三次小冰期。在小冰期内，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 $2^{\circ}\text{C}$ 左右。在我国，就是太湖、洞庭湖、汉江有时结一点冰。那时上海的温度，冬季（十二月——二月）平均约比现在低 $2-3^{\circ}\text{C}$ ，最低达零下 $11-12^{\circ}\text{C}$ 。在冬天这样的温度，对上海来讲，并不是罕见的。一九六七年，距今只有六年，那一年上海的冬天就曾出现过接近小冰期的气候。但上海郊区的贫下中农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意气风发，战天斗地，照样获得了农业大丰收。人类同冰川究竟是谁怕谁？在这一桩桩一件件事实面前，难道还不能够做出正确的结论



来吗?

是人定胜天，还是天定胜人，这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早在二千年前的《天论》中，就曾发出了“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的豪言壮语。只有那些愚蠢的唯心主义者，才会在异常气候面前唉声叹气、消极悲观，乃至求神拜佛，把希望寄托在玉皇和龙王的身上。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还能怕冰川？人类同小冰川已经打过多交，每次都不是冰川战胜了人类，而是人类战胜了冰川。今后若再相遇，又有什么可怕！“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待到冰川“归来”时，人类必将在同冰川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并且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

当然，人定胜天，并不就是天从人意。对气候异常可能造成的危害，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而要做好准备，采取相应的措施。要取得对“天”的胜利，必须发扬革命精神，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自有人类以来，这种斗争就一直在进行着。人类社会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就以农业来说，农业发展史就是人类同异常气候的斗争史。农业生产需要风调雨顺，但历史上的真正风调雨顺的年份是不多的，大多数年份倒是风不调、雨不顺。不利的气候条件，只能吓倒那些懦夫懒汉，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相反地倒是会激励斗志，促进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天旱，雨水不足，才想到去找地下水。天涝，农田受淹，促进了开渠挖沟。正是由于气候异常造成了季节的提前或推后，人们才不断改良和选育新品种，使农作物的生长能与气候相适应，使得生物界更加丰富多采。事实证明，从长远看，每一次气候的变异，不是造成了农业的退化和衰萎，而是推动了农业的革新和进步。

种地如此，识天也是如此。气象学也是在人同异常气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气候异常会打乱我们计算气候变化的公式，增加了我们认识气候的复杂性，但矛盾的充分暴露，是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前提。吃一堑，长一智。人类在长期与造成洪水滔天和赤地千里的异常气候斗争中，一点一点地积累了认识气候的知识，渐渐地掌握了气候变化的规律，由风云莫测发展到风云可测，由测之不准到测之较准。如今人们已经不仅能够预知几天的，而且能够预知几个月以至几年的天气



趋势；不仅能预报小范围，而且能预报数千里乃至更大范围的气象变化。在古代那样原始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祖先尚且能够一次次地战胜异常气候，栽培出品种那么繁多的农作物，把大地装点得色彩缤纷，分外妖娆。那末，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如果竟有人相信气候异常将造成一个“缺粮的时代”，恐惧莫名，惊慌失措，那就真可以说是我们祖先的不肖子孙了。

在今天，宣扬“冰川恐怖”和“缺粮时代”论调最卖力的，事实上恰恰大多是号称“超级”、“发达”的国家。在那些国家里，并非没有发达的气象科学技术，也并非没有先进的农业机械和栽培技术。只是由于反动的社会制度和政治路线，才使人们不可能动员和组织起来同自然界进行有效的斗争。天灾并不一定都能造成灾祸，而人祸却往往会助长天灾。今年世界市场上粮价的不断上涨，就是由于社会帝国主义因国内严重粮荒在全球各地大量搜刮粮食而造成的。在勃列日涅夫之流的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下，苏联农村的集体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农民纷纷脱离土地，大田生产无人经营。正是在这伙败家子的糟蹋下，才使苏联由世界的谷仓变成了“缺粮的国家”。这明明是入祸，岂能归罪于天灾！

当前，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正在进行一场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战斗。“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天大旱，人大干。广大群众学习大寨贫下中农“千里百担一亩苗”的冲天干劲，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叫高山低头，命河水让路，已经取得、并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改造自然的胜利成果。你气候异常，我的措施也异常。你道高一尺，我魔高一丈。那怕气候千变万化，革命人民总有对付之法！只要我们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就必定能在认识和改造气候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展望未来，豪情满怀。人类将继续在战胜异常气候的斗争中阔步前进。

（原载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第二期）



# 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促进派

严 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群众运动正在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几年来，数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批批开赴祖国的农村、边疆，雄赳赳地行进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上。在今后的几年内，将继续有大批的知识青年走上这条道路，到广阔的天地里去锻炼成长。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要根据十大关于“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的号召，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以极大的热情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鼓励知识青年沿着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昂首阔步地向前迈进。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道路，是我们党领导青年运动，教育青年为革命而斗争的宝贵经验和光荣传统。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指出：“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并把愿意不愿意、实行不实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作为辨别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标准。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道路，成千上万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远千里万里，历经千辛万苦，到延安、到边区、到敌后的广大农村，在党的领导下，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边生产，一边学习和工作，成为革命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知识青年同工农相结合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是毛主席向社会主义时代的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发出的伟大号召，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加速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一个重



大部署。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组成部分,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措施。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知识青年,包括共产党员、党的高中级干部的子女,都有一个成为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都有一个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把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承下去,坚持到底,这不仅需要从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中挑选和培养接班人,而且需要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来教育革命后代。把青年教育好了,使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能够紧紧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打成一片,坚持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会后继有人,就能不断发展壮大。

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锻炼人改造人的革命洪炉。知识青年到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把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对毛主席、共产党和新社会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和黑暗的旧社会有着刻骨的仇恨。这种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对新旧两个社会的鲜明对比,正是青年们所必需的。在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中,一事当前,贫下中农怎么说,怎么做,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生动情况,经常要反映到青年的头脑中来,引起学习和思考。知识青年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结合这些丰富的实际材料,来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就比较容易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以致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具有重要意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农业的状况如何,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考虑问题,制订计划,安排工作,都不能忘记农业这个基础。**“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农、轻、重为序,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不仅需要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艰苦奋斗,而且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需要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到农村去干革命,同贫下中农一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历史赋予社会主义时





代青年们的光荣责任。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如何深入，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如何进一步展开，平原如何建设，山区如何改造，怎样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机械化，这些都需要有志气的青年同贫下中农一道去施展抱负和才能，艰苦奋斗，作出贡献。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成批成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在结出丰硕成果，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战斗在全国各地农村的知识青年，通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高。许多知识青年，迅速成长为农村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分子、优秀的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成长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正在茁壮成长。农村改造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改造农村。这些知识青年在农村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同贫下中农一起进行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为推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改变农村面貌，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有力地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其他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一样，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和苏修叛徒集团一样，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变相劳改”，这正好暴露了他们站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极端仇视劳动、敌视劳动人民的丑恶面目，暴露了他们是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观念的代表。几千年以来，剥削阶级总是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把读书上学当作成名成家、升官发财的阶梯，从来不讲读书种田。顽固地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思想代表孔子，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不知道耕田，又不知道种菜的家伙，他还反对学生参加劳动，把要求学种田的学生骂为“小人”。历代的剥削阶级无不把孔子捧为“圣贤”，顶礼膜拜。林彪一伙就是搞孔子那一套的。他们妄图用它来毒害青年，腐蚀群众，把青年们引上邪路，充当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深入批判林彪一伙的反动谬论，肃清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同各种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观念决裂，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有人认为读书务农总是不那么光荣。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剥削阶级轻视劳动、轻视农民思想的反映。革命的青年，革命的家长，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当同这种思想划清界限，坚决予以抵制。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财富，包括物质



财富和科学文化，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战斗，这是极其光荣而豪迈的事业。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人民内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革命分工的不同。种田的，做工的，当干部的，只要是为革命而工作，他们的劳动都是受到社会尊重的。每一个有志于农村的青年都有权利自豪地说：读书务农，无上光荣！

帮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成长，这是我们党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爱护，也是革命家长的光荣职责。青年是祖国的未来，革命的希望，做父母的应当鼓励子女按照革命利益的需要上山下乡，远走高飞，到五湖四海去闹革命，到艰苦的斗争中去学会独立工作和生活。这比起在城里吃现成饭虽然要苦一点，累一点，但吃了苦头，增长了才干，劳了筋骨，炼红了思想。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吃苦、劳累是完全值得的。经过风吹雨打的人才能风里来雨里去，才能经得起革命斗争的考验。如果只想到如何使子女生活过得舒服些，扯子女的后腿，甚至利用职权，拉关系，走“后门”，阻碍子女下乡，那就不利于对子女的培养教育，就会使子女滋长特权观念和怕苦怕累的思想。从表面看似乎是爱子女，从实质看，是害子女。在阶级社会里，爱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对自己的子女应当讲无产阶级的“阶级之爱”，不要搞违背革命利益的“父子私情”。人对事要出以公心，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给我们一定的职位，把权力交给我们，是要我们为人民谋利益的。我们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注意防止和纠正不正之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广大革命干部要带头送子女下乡，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促进派。

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还必须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注意研究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农村，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一支伟大力量。他们把从学校里学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带到农村，通过贫下中农的帮助，把它同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结合起来，就能不断丰富和发展，就能在改造农村的斗争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估计。要把他们看成宝贵的财富，而不应当看成“包袱”。要积极支持知识青年的革命首创精神。“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不要把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要让他们干，不要怕“捅漏子”，让他们在干中学习，增长才干。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头上，才能学会阶级斗争，学会识别真假



马克思主义的本领；在生产斗争的实践中，才能领会到扶犁掌耙的要领，积累起丰富的生产经验；在参加农村科学技术研究的活动中，才能把从书本上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同农村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干的过程中难免出些差错，但这不要紧。吃一堑，长一智，失败是成功之母。通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就会变得聪明起来。许多地方的实践证明，只要加强领导，放手让他们干，在干的过程中注意帮助他们总结经验，他们就能迅速得到提高。

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他们中间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是毫不奇怪的。不能因为这些就抹杀了他们的优点。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看青年，要看本质，看主流。他们远离父母，远离城镇，来到农村干革命，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行动。有的青年喜欢“放炮”，对于错误的东西，敢于“开火”，对领导工作也爱提意见，说话有时还带点“刺”。这到底是缺点还是优点呢？这是社会主义时代青年们的可贵品质，正是有革命朝气的表现。这种革命精神是值得在青年中间大大提倡的。如果对它看不惯，甚至把它当成缺点加以指责，那就不对了。对于知识青年确实存在的缺点，不能采取讥笑、讽刺、简单粗暴的态度，也不能撒手不管。应当坚持正面教育，多做说服工作。要以满怀热情的态度来说话，帮助他们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正确对待理想和前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扎根农村干革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意义重大，影响很广。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要认真贯彻十大精神，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教导为指针，统筹解决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把这项工作做好。要注意把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层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鼓励知识青年踊跃上山下乡。要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面关心知识青年的健康成长。青年是长知识长身体的时期，他们生龙活虎，精力旺盛，需要吸收大量的精神食粮，我们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联系农村的实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文化技术知识。要注意在知识青年中发展团员、党员，提拔干部。对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按照党的政策，重在政治表现。对知识青年要实行同工同酬。要注意帮助青年们掌握生产知识，学会自理生活。要照顾女青年的生理特点。对知识青年的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治病问题，婚姻问题等等，都应当予以关怀和照顾。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要发动群众，坚决揭露和打击。并且注意防止和纠正不正之风，表扬先进，推动全面。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做，就能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群众运动更加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



# 谈 反 潮 流

李 庆 霖

反对错误潮流，坚决地同它作不疲倦的斗争，是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早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就说过：“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为了坚决抵制反动的、错误的潮流，防止和避免它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能引起的破坏，不仅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而且党外的广大真心实意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也应有这种精神。共产党员和党外的革命者，大家同心同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抵制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错误的潮流，不让它兴风作浪去危害党、去危害革命、去危害社会主义，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就会更加兴旺起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我们应当好好地听从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和不断向前发展，批林整风运动继续深入的大好形势下，努力学习并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思想武器，提高对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识别能力，在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中，认真实践，善于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善于区别革命潮流和反动潮流。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认真观察，仔细辨认，刚一露头就能及时发觉，加以防止，夺取主动权，而当它开始发展的时候，能够全力以赴，坚决抵制。

在反动的、错误的潮流面前，革命者应当是无所畏惧的勇猛斗士。任何犹豫、妥协、畏缩和退避的行为，都是可耻的，都是私心重和骨头软的表现。誓为全人类的最壮丽事业——共产主义而慷慨地贡献自己一切的无产阶级战士，当



他们为革命冲锋陷阵的时候，完全是无所畏惧的，最富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他们既不前怕龙，也不后怕虎。

敢于反潮流，最要紧的是要出以公心。这里说的公，是无产阶级的公，就是全心全意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出以公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鲜明表现。革命实践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最能出以公心，坚持革命原则，敢于反潮流的光辉榜样。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光辉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艰难困苦的战斗环境，还是惊涛骇浪的峥嵘岁月，每当反动路线的逆流汹涌冲击过来时，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领导着我们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努力使自己成为敢于反潮流的革命战士。事关路线和事关大局的重大问题，要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坚决斗争到底。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同志，一帆风顺的处境是有的，但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这是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个风险，拿来同革命事业的整体利益相比，那就简直微不足道。我们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即使一时受到挫折，最后也必然取得胜利。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同志，他们有时看来是少数，好象势孤力单。其实，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敢于反潮流，正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利益。所以，他们在反潮流的斗争过程中，决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十分雄厚的革命力量作坚强后盾的。有人说：“反潮流危险，随大流保险。”如果是由于一时的认识不足，产生如此糊涂的想法，那就应当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以求认识水平能有不断提高。否则，这是十足的利己主义的表现。有了这种思想，不可能为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而“鞠躬尽瘁”，做不到“俯首甘为孺子牛”。到革命队伍里来寻找个人的功名利禄，来混饭吃，其面目实在可憎！

更有一种人，他们自己不敢反潮流，看到别人反潮流，就忙着把自己装扮成饱经风霜和深明世故的“识时务”者，似乎很关切地说：“你敢反潮流吗？历史上不是有人敢于反潮流，却落下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对于这种人的论调，我们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给以回答。在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潮流，总是反映着各个时期社会上各阶级的思想和利益的。有进步的、革命的潮流，也有落后的、反动的潮流。进步的革命的潮流，代表着先进的革命阶级的利益，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



用。落后的反动的潮流，代表着反动的、腐朽的没落阶级的利益，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所谓历史上有人反潮流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要看反的是那一种潮流。我国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他们的斗争矛头对准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斗争的目的是为着把社会推向前进，他们所反的是反动的逆流。但是，由于他们还缺乏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领导，革命的斗争策略不能很好地适应当时的实际斗争情况，加上当时的反动势力还相当巨大，所以，在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都先后失败了。然而，无数革命英雄的革命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他们根本不是“身败名裂”，而是扬名千古，流芳百世。与此相反，有的人反的是进步的革命潮流。由于他们是反革命、反人民、反进步的，在革命洪流滚滚向前的形势下，他们必然被革命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落下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这是罪有应得，完全活该。他们是腐朽的反动营垒里极端顽固的卫道者。他们的目的只不过为着死命保住反动统治，硬要历史开倒车，这根本谈不上什么敢于反潮流的问题。

有的同志对于错误潮流，总是小心翼翼，不敢坚决抵制，生怕犯错误。这种顾虑也是多余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明确提出了判断我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并且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明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解决那些矛盾，以及如何去解决。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拥护党的领导，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百折不挠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为着革命的最大利益，敢于站出来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并注意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用不着害怕在斗争实践中事实上难免的说错话和办错事的。一经发觉是错了，就坚决纠正，纠正得越快越好，早纠正比迟纠正好。如果为着保存那极不光彩的“面子”而顽固地坚持错误，不愿改正，引起错上加错，那就不好了。

革命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当我们打退一种错误潮流以后，并不见得就大功告成，就可以一劳永逸了。由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潮流也会长期存在。被击退的反动逆流，还会变换各种形式，卷土重来。适应错误潮流的旧习惯势力，也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的。我们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努力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继续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 科学普及读物要生动地宣传唯物辩证法

——评新版《十万个为什么》

翟 青

在气象万千的自然界里，有千千万万个“为什么”需要我们去认识和研究。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编辑出版更多更好的科学普及读物，帮助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自觉地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这是出版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

近几年来，各地陆续出版了一批科学普及读物，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就是其中可喜的收获之一。这套科学普及读物，从一九七〇年以来已经出版了十二册，内容涉及到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地理、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领域。它在揭示自然界的奥妙、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较为生动地宣传了唯物论和辩证法，为工农兵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供了自然科学上的依据，给读者以多方面的启发和教育。

新版《十万个为什么》中所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同工农业生产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生活气息很浓。你看它讲的内容，从纺纱织布到炼钢造船；从掘煤采油到找水探矿；从植树造林到养猪育种；从观风测云到引水发电，那一项不同人们改造自然的现实斗争息息相关？新版二千多个选题，与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的《十



万个为什么》相比，有三分之一左右是新增添的。它们从不同侧面生动地总结了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创造的丰富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被剔除的旧版选题，主要是那些“国王赏米”、“古希腊数学家刁藩都的年龄计算”、“被老鼠咬破的米店发票的米价推算”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内容。新版和旧版引导人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一个是向人们表明“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科学，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知识的结晶；一个则是诱导人们远离实践去猎奇，似乎只要在故纸堆里苦修苦练，便可豁然领悟茫茫大自然的一切，创出惊天动地的科学业绩。新版和旧版的区别，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究竟是宣传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宣传唯心论的先验论？旧版谈的虽然也是自然科学，但有不少地方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反科学的唯心论。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则密切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出题目、找答案，证明了人对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来源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实践，这就坚持了唯物论，批判了唯心论。

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在讲述科学知识的过程中，较好地揭示了劳动人民是创造科学技术的主人这一真理。一部自然科学史证明：自然科学的成果，是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发展密切相联系的，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用个别人物的“灵感”来说明科学上的创造发明，是错误的。因此，宣传科学知识、介绍先进技术同表现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完全一致的。新版《十万个为什么》热情歌颂了科学技术的主人——工农兵群众的聪明才智和伟大创造力。以第二册中介绍南京长江大桥的一组文章为例，它在描绘举世瞩目的大桥雄姿的时候，引出“这奇迹般的宏伟建筑是谁创造”的问题，然后通过中流砥柱般的九个桥墩怎样昂首挺立在惊涛骇浪之中，钢梁怎样从墩上凌空伸展跨出江面拼到前面的桥墩上，百吨重的预应力梁怎样吊到几十米高的引桥桥墩上，双曲拱桥怎样运用到大桥建筑等一系列矛盾的展开和解决，不仅介绍了建造大桥的科学知识，也歌颂了建桥工人的丰功伟绩。这就有助于读者在弄懂科学知识的同时，加深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理解。当然，表现工农兵群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并不排斥科学技术工作者在总结经验和创造发明方面



所起的作用。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现在，有些科学技术读物或多或少地有意回避这个问题，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对历史上一些确有贡献的科学家及其成就，除哥白尼与达尔文外，均不提及，是一个缺陷，有待改进。

科学普及读物所涉及的科学内容是十分广阔和丰富的。但是，一本好的科学普及读物，总是选取那些对当前三大革命运动有重要意义的实际材料，从而揭示自然界的固有规律，给人以启发和教育。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在介绍自然科学内容时，并没有就事论事地罗列现象，而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具体的科学内容进行剖析，讲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道理，引导读者在探求科学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努力掌握蕴藏于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如第十一册讲“为什么世界上的植物种类那么多、那么复杂”，它从植物发展的历史讲起，通过几种有代表性的植物，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植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发展历程，这就告诉了人们：地球上如此名目繁多的植物并不是自古就有和万古不变的。最初的植物结构简单，种类贫乏。在数亿年的漫长岁月中，气候骤冷骤热、山川时升时沉，沧海桑田，引起植物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不断变化，终于造成了今天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还进一步告诉读者，人们经过主观努力，可以驯化植物，培育新的品种，使植物按照人们的需要定向发展。这样以辩证唯物论的运动观阐述科学知识，证明了万事万物都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对把世界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形而上学宇宙观，也是一个批判。

如此说来，是不是要求科学普及读物去大量地论述哲学原理呢？不。科学普及读物既不能代替哲学课本，也不能以自然科学材料印证哲学道理为满足。它宣传唯物辩证法，主要应当把它渗透在讲述的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中，达到有机的结合。《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一点上是下了功夫的。如第七册中的“为什么下雪天也会打雷”，说的是同时发生的两种根本不同季节的天气现象，岂不是奇怪得很？那么，朔风怒吼、雪花飞舞的隆冬突然电闪雷鸣，原因何在呢？原来，当地面的冷空气降到了摄氏零度左右（具备了下雪的条件），一股强盛的暖湿空气与冷



空气汇合，并沿着它猛烈爬升，形成了积雨云(具备了打雷的条件)，两种条件融为一体，又下雪又打雷的自然现象就发生了。读者了解了这些气象知识，也就加深了对唯物辩证法关于“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的原理的认识。

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但是，自然科学作为人们认识自然的武器，决不能停留在解释自然界，而应当阐明人们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的自觉能动性。毛主席说：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也应当是科学普及读物的任务。新版《十万个为什么》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分析和研究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经验，着力表现了劳动人民改造和征服自然的主观能动性，人定胜天。第八册中解答“为什么能叫山洪淤灌农田”就很有说服力。过去，人们都把山洪比做“猛兽”，看成是绝对的有害。其实，山洪也是一分为二的。它水流湍急，冲毁田园，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山洪中有大量水、肥、土，又对农业生产有利。因此，在山洪河道上修堤筑坝，开渠建闸，分散水势，免除水患，引山洪淤灌农田，就能“夏浇地肥又抗旱，伏天浇地如油灌，秋浇明春地不干，庄稼穗齐又饱满”。这样讲科学知识，发人深省，能引导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变害为利。《十万个为什么》中介绍的煤、油变衣料；木屑变酒精；泥巴变宝石；废水变合成纤维等等，都较好地阐明了自然辩证法，使读者在了解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受到唯物辩证法的教育。这样的科学普及读物，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普及科学知识本身。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十万个为什么》从旧版到重新修订出版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新旧两版都有“地下为什么有石油”这个选题。但是，旧版根据国外大油田都在海相沉积岩中的表面现象，写上了石油“是在浅海里形成”的结论。而这正是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学者捏造“中国贫油论”的理论根据，完全不合中国陆相生油的实际。新版则总结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实践，证明不论是海相沉积还是陆相沉积，“只要含有丰富的有



机质，以及适合于有机质保存和转化的条件，都可以生成石油”。这就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驳倒了“陆相无油”的唯心主义谬论。两个版本，两种讲法，得出的结论是何等不同啊！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深刻的教训，科学普及读物要达到宣传唯物辩证法的目的，更好地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服务，就一定要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不要被自然界的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

社会主义的科学普及读物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我们在编写的时候遵循“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的原则，使工农兵所易于接受。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努力实践这个基本原则，在介绍科学知识时抓住事物的本质，进行深刻的分析，又通过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语言，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把深奥的事理浅显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生动活泼，趣味盎然。当然，就生动地宣传唯物辩证法这个要求来说，新版《十万个为什么》还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在选题方面更注意内在联系，使知识向纵横两个方面伸展开去，既注意历史的叙述，说明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又注意阐明与其他物的多方面的联系。在写法上，必须注意阐明对立统一规律的作用，着重揭示与分析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总结解决矛盾的经验。只有这样去做，才能真正达到引人入胜。

出版更多更好的科学普及读物，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毛主席说：“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又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有助于进一步弄通马克思主义，有助于做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编辑出版科学普及读物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看到出版部门能更多、更好地出版一些介绍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史的通俗读物，出版一些适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需要的科技读物，出版一些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需要的医疗卫生读物和供青少年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参考读物。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出版部门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科学普及读物问世！



# 这样的评价符合历史实际吗？

——评《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对孔子的介绍

钟 泽 宋 新

最近看到，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以下简称《简编》）。这套资料，原来叫做《中国历代哲学文选》，曾于一九六二年出版。一九七二年五月更名重印，据《简编》的“出版说明”介绍，是为了“满足当前工农兵和干部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参考需要”。

编写出版一些资料，帮助读者学习哲学史，这是必要的。但是，把《简编》这样一部十年前的东西拿出来满足当前的需要，送给工农兵作参考，总应当或者对原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作些改动，或者说明一下哪些观点是错误的。可惜都没有。出版者在“出版说明”中说：这套资料“对原著者哲学思想的分析、评价以及对中国哲学史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方面，也有不够恰当的地方，有些问题学术界还有争论。我们希望读者能进一步予以探讨，并提出宝贵的意见”。确实，《简编》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评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事实的。

《简编》对孔子是怎么评价的呢？它虽只一千多字，却把孔子捧上了天。它说：“孔子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有理论体系的思想家和第一个以私人资格创立学派的人。”抽象地把孔子说成为创立学派的第一个人物，是不符合先秦阶级斗争的情况的。在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末期，社会阶级矛盾十分激烈，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思想家，从事建立本阶级的理论体系和学派活动，而逐步形成诸子争鸣的局面。这“私人”是指哪一家呢？这“第一个”是指哪个阶级的呢？都没有说明。与孔子同时，就有一个法家先驱的思想家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对立，创立学派讲学，与孔子争学徒，孔子之门为之“三盈三虚”。以致孔子一当了鲁国司寇，少正卯就被加以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的罪名，而死在孔子的刀下。

《简编》接着说：孔子的学说“代表着当时从奴隶主贵族分化出来的一部分新





兴封建贵族的利益”，“总的倾向却是和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相适应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生活在奴隶制行将崩溃的春秋末期，时刻梦想复兴文王、周公之道，毕生为了挽救没落的奴隶主专政免于灭亡而奔走呼号。他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要将已经衰亡了的奴隶制王国复兴起来，继续奴隶主贵族原有的世袭特权，把那些失去权势、变为“逸民”的贵族重新拉上台去。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正说明了他的一套反动说教是和“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从孔子一生的言行来看，凡是当时发生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体现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要求的重大事件（例如，晋国铸刑鼎，公布了封建制的成文法；鲁国大夫季氏实行封建化改革的田赋制），他都坚决反对。把这样一个奴隶主贵族顽固派，说成是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究竟有什么根据？

《简编》甚至还吹捧孔子“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认为“仁”是“孔子所提出的新的道德观念，要求贵族们尊重、关心社会上其他阶层的利益”，“把‘爱人’作为最高的道德”，等等。总之，孔子变成一个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甚至代表对立阶级利益的人物了。但这不是历史上的真孔子，而是并不存在的假孔子。

孔子这个奴隶主阶级顽固派，在当时的人民群众中间不仅不受欢迎，而且名声很臭。有的人就指责孔子是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固派；有的则直接骂他到处流窜，“累累若丧家之狗”。《庄子·盗跖》篇讲的当时起义奴隶的领袖跖痛斥孔子的一段故事，更是反映了人们对孔子的厌恶。以跖为首的起义部队，“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吓得那些贵族统治者闻风丧胆、紧闭城门。孔子认为跖是非除不可的“天下害”，就带领徒弟去找跖，妄想以他的虚伪说教和高官厚禄来诱降这个起义奴隶领袖。跖一开始就根本不愿见孔子，骂他是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的政治骗子，是个“罪大极重”的“巧伪人”。见面之后，跖就和孔子展开辩论，不仅有力地揭穿他的一套说教和诱降是极尽“诈巧虚伪”之能事，严正声明“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而且尖锐地指出历史的颠倒：“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跖的这场驳斥，真是痛快淋漓！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了跖所代表的奴隶阶级和孔子所代表的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是针锋相对的，二者之间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如果硬要说什么孔子的思想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要求，岂不是在宣



扬阶级调和、否认阶级斗争吗？

毛主席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民。孔子宣扬什么“仁者爱人”，是没有阶级内容的吗？根本不是，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论语》所说的“人”和“民”，都有一定的阶级界限：“人”主要是指奴隶主贵族，“民”是指被“人”驱使的奴隶和劳动者。“爱人”并不是对各阶级的人“一视同仁”，而是只限于爱奴隶主贵族。

所谓“仁”、“爱人”之类的花言巧语，在当时就是为破坏社会变革，挽救和复辟奴隶制服务的。孔子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就是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要人们按照西周初期奴隶制全盛时代的一套规矩办事，不得有一丝一毫的越轨行为。“复礼”既是要历史开倒车，实行“仁”也必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设想。“仁”既是没落奴隶主的意识形态，又怎么能把它说成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呢？然而《简编》竟完全抽掉“礼”的阶级内容，说什么“孔子所提倡的‘礼’，重在内心的情操，而不在于表面的繁琐的仪式”。按照这种荒谬的观点来解释，不仅把孔子“复礼为仁”的反动政治目的掩盖了，甚至连刘少奇的“自我修养”、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货色，都可以说成是美妙的“重在内心的情操”了！

“仁”不仅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整个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孟子继承了孔子鼓吹的“仁”，并把它发展成为“仁政”学说。但孟子在鼓吹这个反动学说时，说了一些“民贵君轻”之类的话，使之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好象孟子提倡“仁政”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这种“王道”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似的，其实，这完全是孟子为了欺骗人民而编造的一个谎言。可是，《简编》也不加分析地对孟子作了吹捧：说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君主以仁爱的心肠对待天下人民”，“民为贵”就是“认为人民是最贵重的”。这种论点同样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是剥削阶级人性论的语言。在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仁爱”，剥削阶级专政是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而决不是对劳动人民施“仁爱”的工具。鲁迅早就揭露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我们应当揭露儒家“仁政”的欺骗性，决不当去传播这种欺骗性。



历史上有不少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反对社会变革，维护或复辟反动统治，总是要打出“为民”的旗号来欺骗人民。特别是当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时候，这种“为民”的叫卖声就喊得更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十九世纪欧洲“封建的社会主义”这一反动思潮时，曾经深刻地指出：法国和英国的贵族，“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精辟的论述，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有力武器。一切被打败了的反动阶级，向新兴的进步势力进行反攻倒算的时候打出“为民”的旗号，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反革命手法。历史上如此，现实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和一九五九年彭德怀猖狂向党进攻时，就曾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一九六一年在刘少奇一伙支持下抛出的大毒草《海瑞罢官》，也是摇舞着这面破旗。直到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还是扯的这面破旗。这些被中国人民所唾弃的反动家伙，他们心目中的“民”只不过是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罢了。在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奴隶主贵族已经被地主阶级打败了，但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进行挣扎。孟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为了骗取社会的同情，他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扑时打出“民为贵”的旗号，好象他不是为了他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倒是为了被剥削的广大农奴或自由民的利益，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我们对于历史上任何人物的评价，都必须根据当时历史的阶级斗争，来考察他究竟站在哪一边，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分析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具体阶级内容。而不能简单地根据他口头上的“为民”一类动听言词，就轻率地对他作出“代表人民利益”的评价。如果不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那就会把历史上许多反动思想家都说成是“人民”的代表了。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曾尖锐地揭露出：所谓“仁义”，本质就是“吃人”。事实正是如此。孔子的“仁”，一直被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用来作为掩盖阶级矛盾和麻痹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腐蚀剂。他们竭力宣扬什么“将心比心”的德性，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革命的人们，当然不能相信这



套骗人的鬼话。如果相信了这套鬼话，那就等于否认剥削，否认压迫，否认阶级斗争，从而也否认了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宣扬过受压迫的人民应该向反动派和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恕道”，搞“和平过渡”，那是在煽动屈膝投降、背叛革命、出卖革命。

至于孔子宣扬的“有教无类”，实际上是孔子的“仁”在教育方面的具体运用。对此，《简编》不但没有一点批判，反而把“有教无类”翻译为：“任何人都可以受我的教育，不因为家庭出身等等的不同而有所限制。”并以美化的语调介绍说：孔子晚年“专力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以私人的资格，把他的知识和学问传授给社会上一般人。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仿佛孔子就是中国历史上不分阶级，实行“全民教育”的开山祖。这又是一个歪曲。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教育事业总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决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有教无类”。孔子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就暴露了“有教无类”不过是欺人之谈。孔子宣传“不学礼，无以立”和“学而优则仕”这条教育路线，表明了他的教育内容就是要他的学生们熟悉周礼、遵守周礼、维护周礼，他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成为能为奴隶主专政服务的官僚和御用文人。历来的剥削阶级利用孔子的“有教无类”来作为招牌，都是为了掩饰教育领域中的剥削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果还把“有教无类”当作一种什么真理来宣扬，那无非是要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里向剥削阶级施“仁政”——教育不分阶级，向一切人开放，这就抹煞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抹煞了工农子弟有优先受教育的权利。过去刘少奇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是这样干的，难道在今天还允许重演吗？

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派。毛主席指出：“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反对党八股》）一切反动派的尊孔，并不是真的要回到孔子的时代去，而是借这个亡灵来欺骗群众，征服人心，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今天，苏修也在那里抬着孔子招摇过市，叫嚷什么：“孔夫子的名字同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精神文化的发展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孔子的一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思想体系，从来是和反动阶级的精神统治“联系着”的，它和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具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神文化不仅是“分割”的，而且是对立的。鲁迅就说过：“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



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今天苏修如此醉心于尊孔，是不是因为他们爱好“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呢？完全不是，而是把孔子当作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妄图实现他们颠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翻开中国近代史就可以看到，“孔夫子的名字”总是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在中国制造反革命复辟的“发展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着”。

国内外反动派的尊孔，是为实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的，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现象。我们革命人民应当研究这种现象，并从中得出经验教训。

在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时候，毛主席曾经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毛主席的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对孔子抱有迷信的人。虽然孔子和武训不是同一时代、同一阶级的人物，但是吹捧孔子和吹捧武训的性质是一样的，在认识论上的根源也是一样的，都是完全违反历史实际的。列宁说：“阶级划分是政治派别划分的最根本的基础，它归根到底总是决定着政治派别的划分的。”（《革命青年的任务》）在我们评价孔子及其学派的时候，必须遵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尊孔和反孔的问题放到阶级斗争中去认识。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走上错误的道路。剥削阶级尊孔的传统观念由来已久，根子很深，影响很大。一些作者在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下，不敢越雷池一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简编》再版时对美化和吹捧孔子的全部内容不作任何修改或批评，就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

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这一指示对于出版战线来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出版战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出版了不少好书，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出版更多更好的图书，就必须开展经常性的书评活动，支持好的书籍，总结创作经验，并对有的图书反映的错误观点进行批评和讨论。我们对《简编》关于孔子评价问题提出意见，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使大家深入一步地来考虑这个问题，更好地进行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不对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